

目 次

序言	1
I：第一個時期	
黨的成立，黨的秘密鬥爭時期和八月革命 (1930年——1945年)	4
在法帝國主義統治下的越南社會	4
準備成立黨、黨的革命綱領	9
1930年至1931年的革命高潮和宣傳蘇維埃	19
革命轉入低潮和恢復運動的鬥爭	25
黨建立印度支那民主戰線，反對法西斯和 戰爭，反對殖民地反動派，要求自由、溫 飽和和平 (1936年——1939年)	3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黨建立反對法西斯 侵略的民族統一戰線，把革命的鋒芒對 准帝國主義法西斯和越奸	42
黨發動抗日救國高潮，準備總起義和總起義勝利	58

序　言

值印度支那共產黨即今天的越南勞動黨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日，越南勞動黨中央宣教部和黨史研究委員會為介紹黨三十年來的輝煌歷史及鬥爭經驗給各黨員同志和我們的全體人民，合編了“越南勞動黨三十年來的鬥爭”一書。

本書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敘述黨的成立：黨的秘密鬥爭時期和八月革命（1930年——1945年）。

第二部分敘述在黨的領導下為完成民族獨立和保衛人民政權而進行的長期抗戰（1945年——1954年）。

第三部分敘述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北方的社會主義建設，並領導為實現祖國的統一而進行的鬥爭時期（從恢復和平到今天）。

除上述三部分外，本書末尾還提出黨三十年來的鬥爭經驗。

本書的出版將分為三冊：第一冊包括序言及第一部分；第二冊包括第二部分；第三冊包括第三部分和經驗教訓。

值黨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日，為及時滿足讀者的要求，我們先出版第一冊，其餘兩冊以後將陸續出版。

我們黨的歷史也就是越南三十年來的革命史。時間有限，搜集資料不足，尤其是歷史上的一些問題還沒有得到總

結，這是我們編輯本書時所碰到的困難。因此，想在一本只有幾百頁的書中充份反映極其偉大和豐富的黨史，我們還不敢有這樣過高的企望。盡管如此，我們為滿足同志們和朋友們的要求，還是大胆地把概述黨史的初稿獻諸於世了。

我們誠懇地希望獲得同志們、朋友們的批評意見和建議，使本書獲得更充份更正確的補充和整理。

越南勞動黨中央宣教部、黨史研究委員會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河內

我們的黨成立於1930年年初，至今剛滿三十周年。我們黨領導越南工人階級和人民進行革命，經過三十年的英勇鬥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1945年8月，黨領導全民總起義獲得成功，在全國範圍內奪取了政權。但是，法帝國主義再一次侵略我國。爲了保衛和發揚八月革命的成果，我們黨發動了長期、全面、全民的抗戰，並且在我國北方勝利地結束了民族、人民民主階段的革命。自從和平恢復以來，黨領導人民在北方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爲實現國家統一和在全國範圍內完成民族、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務而鬥爭。

三十年來，在黨的領導下，越南革命所取得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在一個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具體條件下的勝利。

值此慶祝黨成立三十周年的時候，我們來共同重溫在黨領導下的越南工人階級和人民最光輝的歷史，回顧越南革命的經驗教訓，了解黨如何正確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越南革命的實踐相結合，克服一切困難與障礙，從勝利走向勝利，從而使我們更加相信我們民族的倔強意志，更加相信以胡主席爲首的黨的英明領導，爲建設一個和平、統一、獨立、民主和富強的越南而奮鬥。

I. 第一個時期

黨的成立，黨的秘密鬥爭時期和 八月革命（1930年—1945年）

在法帝國主義統治下的越南社會

印度支那共產黨（即今天的越南勞動黨）的誕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越南民族解放運動和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黨在1930年初成立，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是由越南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

法國殖民者在1858年開始侵略越南，以阮室王朝為代表的封建地主階級，向侵略者投降。1884年條約就是確鑿的證據。但是越南人民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接連起義，反抗侵略者和賣國賊。因此直至十九世紀末，法國殖民者才能在越南建立起他們的統治機構。

在結束武裝侵略階段後，法國的壟斷資本家才開始開發越南。

在經濟方面，首先，他們與建立銀行放高利貸的同時，施行了繁重的稅收政策和掠奪土地，使大批的農民貧窮化，造成了一個廉價勞動力的市場。

在工業方面，他們逐漸建立紡織、釀酒、造紙、火柴、
磚瓦、水泥、水電等企業。值得注意的是他們沒有發展重工業。
採礦工業進行得很遲慢。至於屬於重工業主要部門的冶金工業和機器製造工業等，“宗主國”則擁有壟斷權。他們只發展一部分輕工業，以保證既獲得最大利潤，又不會與
“宗主國”的工業相競爭。

在商業方面，他們壟斷了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越南的資本只處於從屬地位。他們在印度支那周圍設立了關稅網，把越南、柬埔寨、老撾變為他們獨有的市場。這樣，他們從法國把商品運來，高價售給印度支那人民，從殖民地攫取高額利潤。

在農業方面，他們保持封建制度的剝削形式，實行營田政策^①，掠奪了越南六分之一的耕地，建立種植經濟作物或稻穀的莊園。法國資本家有很多人同時也是莊園主。

在政治方面，他們從世界地圖上抹掉越南的名字，有系統地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他們把越南分為三折，分別置於不同的統治制度下：南折為屬地；中折為保護領；北折為半保護領、半屬地。他們不斷地在越南、柬埔寨、老撾間製造成見，在印度支那各國中人口衆多的民族同少數民族間製造成見。在越南、柬埔寨、老撾，他們直接掌握了行政、軍事和各專門機構。越南的封建地主階級只不過是個傀儡角

① 营田政策：法殖民主義者有取得大片荒地的專利權。名為開墾，實則掠奪農民在荒地中已開墾了的土地，並剝削農民的勞動力，強迫住在該地的農民繼續墾荒。——譯者註

色，當他們的走狗。其他各階級在政治上則沒有一點權利。

概括的說，法帝國主義在越南的一切“開發”計劃，目的是變越南成為銷售“宗主國”商品的市場和供應原料的地方。越南的封建社會變成了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同時越南社會的階級關係，某些地方也起了變化。

越南封建地主階級密切地勾結帝國主義，以維持它的利己權利，而法帝國主義則依靠地主階級來剝削、壓迫越南人民。從階級方面來看，地主階級是越南革命的對象。但是，當革命的鋒芒主要是針對帝國主義壓迫和侵略者時，在地主階級中也有一些人抗法。他們大多數是小地主、知識分子、學生、和地主子弟，但這些人是不能代表整個地主階級的。

越南資產階級在封建社會裏就已經萌芽。自從法國侵略越南後，這個階級逐漸得到形成和發展。但是由於受到排擠，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和大戰後，才明確地成為一個階級。生長在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裏的越南資產階級，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分化為兩部分：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

越南的買辦資產階級，包括大資產階級，它們的利益和帝國主義的利益密切相依。他們取得了為帝國主義收購國內的物產和推銷帝國主義商品的代理人的特權，同帝國主義合資經營工商業，或承包殖民者的各項建築工程。和封建地主階級一樣，買辦資產階級也是我國的反革命勢力。

越南民族資產階級，包括中等資產階級，他們受到法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排擠和限制，因此數量少，經濟力量薄弱，無法與帝國主義競爭。在利益上他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

勢力有矛盾，但同時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在經濟上又有着一定範圍的關係（大多數的民族資本家是銷售帝國主義商品的商業資本家，一部分兼有地租的剝削），並以剝削工人階級來發財致富。因此，民族資產階級有着兩面性：一方面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贊成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另一方面，態度搖擺不定，當帝國主義強大時就易於妥協，有改良主義思想；當羣衆革命運動高漲時，就倒向革命。正因此，越南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越南革命。

越南農民階級約佔人口的90%，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殘酷的剝削和壓迫（繳納繁重的苛捐雜稅、高額地租、高利息，當僕役，被毆打，被掠奪土地等等）。因此，農民迅速貧窮化。一部分破產和被迫拋開土地的農民到工廠、礦山和莊園工作，變成了工人。一部分被迫到新喀里多尼亞島和新赫布里底羣島當苦役。另一部分則失業，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一些還保住土地的農民，生活則不斷受到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自然災害的威脅。農民，特別是貧雇農和缺乏土地的中農，對反帝反封建非常積極。自古以來，越南歷史上的解放戰爭，實質就是農民戰爭。在民族、人民民主革命中，農民是革命的最巨大的力量，是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

越南小資產階級，包括各手工業者、小商販、小老板以及職員、學生、知識分子等許多不同的階層。雖然他們的生活水平多少有些差別，但是一般來說，他們的生活都是不安定的，經常受到破產和失業的威脅。他們常在革命運動的高潮時傾向於革命，在革命遇到挫折時就容易發生動搖，但是一般來說，他們非常踴躍地參加革命。他們是革命的重要力

量，是工人階級可以信任的同盟軍。

和法國資本主義在越南發展的同時，越南工人階級誕生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法帝國主義加強“開發”殖民地的政策，越南工人階級獲得了相當迅速的發展，並變成重要的社會力量。工人階級是包括沒有生產資料、靠出賣勞動力維持生活，並受到以工資方式剝削的勞動者。他們是在各企業裏集中的勞動生產者和在各個城市、工業區集中生活的人。他們是最進步的社會生產力的代表。因此，工人階級是一個最徹底的革命階級，它具有比其他階級要高的政治覺悟、組織能力、紀律性和創造性。除了具有上述國際工人階級的共同性，越南工人階級還有如下的特點：生長在一個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度裏，遭受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國內資產階級等的三層殘酷剝削、壓迫，因此，要解放自己，就得為使民族從被壓迫、被剝削中解放出來而鬥爭。在越南工人階級內部沒有向資產階級妥協的改良主義的貴族工人階層。由於與農民階級有着血肉的關係，越南工人階級具備有利的條件實現工農聯盟。越南工人階級在對外方面沒有受到第二國際的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而是受到俄國十月革命、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國和法國工人運動的影響，因此它較早地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正因為具有上述特點，越南工人階級雖然人數不多，但很早就成為革命的領導力量。

根據上述對黨成立之前的越南情況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越南社會存在兩個基本矛盾：民族與帝國主義壓迫的矛盾和廣大勞動人民羣衆（主要是農民）與封建地主階級的矛盾。越南革命必須解決上述兩大矛盾，否則越南社會無法前

進。歷史把領導越南革命的任務賦予越南工人階級，以解決這些基本矛盾，推動越南社會前進。

準備成立黨、黨的革命綱領

自從法帝國主義統治越南，一直到1929年期間，我國人民曾經不斷地進行鬥爭，起來反抗侵略者及其走狗，如：在南圻的抗法起義（1861年——1868年），勤王運動（1885年——1895年），安世的游擊運動（1887年——1913年），擺齊（Bai say）起義（1885年——1889年），東京義塾運動（1907年），中圻的抗稅運動（1908年），太原起義（1917年），要求釋放潘佩珠老先生和追悼潘珠楨老先生的愛國運動（1925年——1926年），安沛起義（1930年）等。多少英雄烈士爲國犧牲，但是結果完全失敗。主要的原因是：越南革命在那個時期沒有一個工人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來領導，各個革命黨派還不能提出一個正確的、爲解決上述兩個基本矛盾的政治綱領。

面對着這種連續失敗的情況，不少越南的愛國者曾經出洋找尋解放民族的道路，但是還沒有誰能爲越南革命找到正確的道路。

在這些愛國者中，阮愛國同志，即我們敬愛的領袖胡志明主席，在找尋革命道路中立下了第一功。他曾經在本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到達歐洲。他到法國不久，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震撼了整個世界。這個偉大的歷史事件，爲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開闢了新紀元，同時也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開闢了新紀元。它給工人階級和世

界被壓迫民族帶來了對自己解放的前途的無限信心。阮愛國同志的政治活動，受到十月革命強烈的影響。它使他作出了如下的結論：要求得民族解放，必須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走俄國人的道路。

1921年，在都爾（Tour）大會上，阮愛國同志參加了成立法國共產黨的工作，並加入了法國共產黨，因為他認清了：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只有共產黨才能解放被壓迫的民族。從此，他成為越南的第一個共產主義者，並不斷為在越南成立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而奮鬥。在“人道報”、“工人生活”、“國際新聞”，特別是在由他主編的“窮苦人”^①等報紙上，阮愛國同志勇敢地控告了帝國主義的罪惡，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論述殖民地的革命問題。他還和法屬各殖民地的一些革命戰士，在巴黎組織了“法屬殖民地民族聯合會”。他的革命活動和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特別是“控告法國殖民主義”的文章，大大地鼓舞了國內的革命運動，並使我們許多越南人開始探求馬克思主義。

1923年阮愛國同志到蘇聯去出席國際農民代表大會。
1924年又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

1924年12月阮愛國同志到了中國。1925年他組織了“東亞被壓迫民族聯合會”，並和當時在中國的越南人的革命組織“心心社”建立了關係，用這個組織作基礎成立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同時在“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中組織

① 此報原名法文為“Le paria”，中國曾譯作“勞動報”，現照越文“Người cùng khổ”譯作“窮苦人”。——譯者註

了“共產團”，以促進在越南建立一個真正的共產黨的準備工作。他在廣州黃埔軍校連續舉辦各個訓練班，給一些從國內到來的青年學習。阮愛國同志就是這些訓練班的講師之一。他還把“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總部機關報“青年報”寄回國內，向越南人民和工人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這個時候許多中國和法國的進步書刊已經秘密地在越南流行。由“東亞被壓迫民族聯合會”宣傳部出版，阮愛國同志著的“革命之路”一書，對越南和東亞各國的革命起着一定的作用。法帝國主義想盡一切辦法蒙蔽輿論，不讓越南人民知道俄國十月革命和蘇聯。他們極力防止法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但是，中國革命和廣州公社的影響波及越南，他們在這方面的一切陰謀手段全告失敗。“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會員的宣傳鼓動工作，使越南人民看清了世界革命運動，和振奮地相信自己民族的前途。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羣衆在歷史中的作用等觀點，第一次在越南得到普及。雖然“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曾經提出了“先搞國家革命，後搞國際革命”的不正確主張，但該會正是我國的第一個革命組織，它在越南人民羣衆中傳播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由於這種宣傳，“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中形成了一派共產主義派。在越南首先追隨馬克思主義的人，開始在思想上武裝起來，看清革命的道路，明白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欺騙性的“改良主義”學說的真象，同時戰勝了改良的民族主義的傾向，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

1927年12月，中國廣州市工人起義奪取政權，在三天內

成立了“廣州公社”。後來雖然失敗，但是“廣州公社”已經強烈地衝擊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和工人階級的心。廣州公社的影響波及我國，大大鼓舞了我國工人階級的鬥爭。在這種情況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組織有了迅速的發展，並逐漸成為國內最有影響的革命組織。至於那些具有資產階級傾向的政治組織，如“越南國民黨”和“越南青年高望黨”^①則漸漸在人民羣衆中失去了威信。

“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的組織發展到哪裏，馬克思列寧主義就傳播到那裏的羣衆中去。但是，如果只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宣傳，而沒有國內勞動人民和工人的鬥爭運動作為這個主義的社會基礎，則還不可能產生共產黨，宣傳工作也不可能向深廣發展。

這個時候，越南工人階級已經成長起來，工人的鬥爭運動日益壯大，不少“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會員到工廠、礦山、莊園去向工人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領導工人進行鬥爭。因此工人的階級意識有了進一步的提高，第一批企業支部已經成立。與此同時還有工會和工人互濟會等組織。在國內各經濟中心，不斷發生工人鬥爭運動。海防水泥廠、南定紡織廠、河內阿維雅機器廠、試場機器廠、西貢巴遜機器廠、南部富連莊園等工人相繼舉行罷工，要求改善生活，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廢除毆打和剋扣工資的制度等等。

工人階級和法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已尖銳化。各工廠之間的工人開始進行配合鬥爭。與工人進行罷工的同時，一些

① 卽阮安寧黨。——原註

地方的農民也進行鬥爭。法帝國主義已經開始出動密探、憲兵和軍隊來鎮壓羣衆運動了。

上述的形勢要求成立一個共產黨來領導越南人民和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

1928年末和1929年初，在越南北方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中出現成立印度支那共產黨的活動。接到“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總部在國外舉行全國代表大會的消息，在這個組織中的北部和中部以北的共產主義者，熱烈地討論了解散“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以便在印度支那建立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在各級的多次會議中，他們的主張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1929年1月，在北方舉行“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全國代表大會籌備會議後，包括有七人的共產主義小組成立起來，以便領導成立共產黨的活動。這七個人中有：吳嘉嗣、阮德貴、阮豐色、杜玉瑜、鄭廷玖等同志。為什麼建立共產黨的活動首先在越南北部開始呢？有兩個原因：一是越南北部是產業工人最為集中的地方，因此，在北方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中的共產主義者，預見到工人階級必須有一個自己的革命政黨來領導印度支那革命；二是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猛烈地波及北方，在北方的共產主義者對在印度支那建立共產黨的迫切性看得更為清楚。

1929年5月1日，在中國的香港舉行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全國代表大會上，越南北方代表團[⊖]提出解散“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成立“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建議。這

⊖ 北方的代表團有吳嘉嗣、國英等同志。——原註

一個提議被多數人所否決。北方代表團退出會議回國。1929年6月“印度支那共產黨”成立，並在人民中散發了黨的宣言。印度支那共產黨的第一批黨員是從北方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的共產主義者中挑選出來的。雖然在政治和組織上還有缺點，但印度支那共產黨的誕生，適應了客觀情況的要求和工人羣衆的願望。因此，在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宣言公佈以後，“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的優秀會員都踴躍加入印度支那共產黨。黨的中央機關報——“斧頭鐮刀報”，工會的中央機關刊物——“紅色工會”雜誌，獲得出版並在羣衆中流行。

在印度支那共產黨影響日益廣泛的情況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總部決定把尚存下來的部分組織（大部分在南部）改為“安南共產黨”。

在中部和一部分在南部的“新越革命黨”的組織，也不能維持舊有組織，因此，也改組成“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聯盟”。

這樣，在1929年中，越南出現了三個共產主義的組織，並都自稱為真正工人階級的政黨，和設法爭取共產國際的承認。在進行宣傳、活動和吸收黨員中，這三個共產主義組織曾經互相打擊，互相爭奪對羣衆的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組織都盡力設法深入各企業中進行組織工人羣衆的活動。當時，在這些越南共產主義組織中還有“無產化”的運動許多小資產階級、學生和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都到工廠、礦山、莊園去組織羣衆和鍛煉自己。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曾寫信給這些印度支那的共產

主義者，指出應該停止這種分裂和宗派的行爲，應共同成立一個統一的共產黨。爲了實現共產國際的指示，阮愛國同志到香港，召集這些共產主義組織的代表開會，討論統一黨組織的問題。1930年2月3日，在阮愛國同志主持下，統一會議在香港舉行。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印度支那共產黨和安南共產黨的代表，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聯盟則來不及派代表出席^①。在聽取了代表們的報告和了解了共產國際的主張以後，會議批判了狹隘和分裂的思想，一致贊成把國內三個共產主義的組織統一起來，建立一個唯一的共產黨，並定名爲“越南共產黨”。同時，會議還通過黨和“印度支那反帝同盟會”以及各羣衆組織的政綱、策略和簡要的黨章、會章。雖然這些文件還粗糙，但已經給越南革命指出了正確的基本路線。這就是由越南工人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目的是爲了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

會議還提出了統一三個共產主義組織的計劃，並選出了臨時中央委員會以領導全黨。

④ 到這次會議召開為止，越南共產黨已經有211名黨員，計：

印度支那共產黨： 85名

安南共產黨： 61名

印度支那共產主義聯盟， 11名

在香港和國外的越南共產主義小組 共54名

總共， 211名

這個數字說明了成立越南共產黨已經到了成熟時期。

——原註

會議還決定發展各個羣衆組織，如：“紅色工會”、“紅色農會”、“青年共產團”、“婦女解放會”、“救濟會”、“反帝同盟會”（即當時的民族統一戰線的組織）。

這次的統一會議與代表大會有着同等的效果，並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義：統一了工人階級的力量，使工人階級有了自己的真正革命政黨以領導越南革命取得全面勝利。

同世界上其它共產黨一樣，越南共產黨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的新式政黨。它是越南工人階級最進步、最覺悟，同時是最高的組織。它具有充份的力量來領導越南人民和工人階級的其它組織。越南共產黨是同羣衆密切聯系的組織，以羣衆利益為自己唯一的利益，並把羣衆看作是自己的強大力量的源泉。它是一個意志統一，行動統一，紀律嚴明，沒有宗派，以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克服缺點，發揮優點的組織。

研究了這次統一會議的文件後，共產國際向越南共產黨發出了指示，對越南革命的任務和路線等問題作了一些補充，並建議把黨的名稱改為印度支那共產黨。

1930年4月，陳富同志回國。

為了實現共產國際的決議和加強對全國正在沸騰着的革命運動的領導，1930年10月，中央舉行了第一次會議，討論越南“資產階級民權革命”^①、黨當前的任務和更換黨的名稱等問題。

會議通過由黨的第一任總書記陳富同志起草的“資產階

①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譯者註

級民權革命論綱”（即政治論綱）。“論綱”指出了當時印度支那形勢的特點：印度支那是殖民地，在經濟上附屬於帝國主義，因此，不能獨立發展。一邊是工人、農民以及勞苦者與另一邊的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轉趨尖銳化。由於這些特點決定印度支那的革命性質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革命的任務是肅清封建殘餘，把土地分給農民，打倒法帝國主義，使印度支那獲得完全獨立。只有打倒帝國主義才能摧毁封建制度，也只有摧毁封建制度才能打倒帝國主義。革命的主要動力是工人和農民。保證印度支那革命取得勝利的主要條件是：必須有一個具有正確政治路線、有紀律、同羣衆密切聯繫和在革命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共產黨。要取得民族獨立和把土地分給農民，必須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當奪得了政權後，依靠無產階級革命已取得勝利的各國無產階級政權的幫助，印度支那將繞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直接跨進社會主義。

這就是1930年10月的“政治論綱”的基本內容。“論綱”補充了1930年2月3日“統一會議”的“簡要綱領”的內容。“政治論綱”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這是越南人民和工人階級第一次有一個相當全面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

“政治論綱”指出了越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總路線，並照亮了越南革命的道路。

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方面，會議認為由於世界和印度支那的經濟危機，使越南人民陷於無限痛苦之中，羣衆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已經發展深廣，而且日益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擺脫“國家主義”的影響。黨當前的政治任務是：“必須

領導羣衆反對白色恐怖，反對捐稅地租，反對施行泰羅制^①的血汗工資制度，反對欺騙的改良主義，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聯。同時必須反對黨內的冒險和盲動傾向。

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會議決定把黨的名稱改為印度支那共產黨。因為“越南、柬埔寨和老撾的無產者雖然言語、風俗習慣和種族不同，但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必須互相密切聯繫”。^②

此外，會議還決定：全黨應以共產國際的決議和黨的政策作為基本材料以整頓內部，使黨布爾什維克化；成立各圻的執行委員會，以領導各圻的運動；加強吸收工人入黨，增加黨各級領導機關的產業工人成分，當黨的工作穩定時，將召開全黨代表大會。

1930年10月的中央決議，對進一步統一黨和鞏固黨有着重要的作用。

1929年——1930年是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發展到了越南各革命階級和反革命階級都必須提出自己的政治綱領以爭取羣衆的一年。1929年6月，“印度支那共產黨宣言”的發表，

① 泰羅制是資本主義血汗工資制度的一種。由美國工程師弗列德里克·泰羅所創而得名。其實質是根據操作規程和時間定額的不合理規定，強迫工人作機械式的緊張勞動，當工人完成產量的定額時，除原定一天工資外，只能得到很少的獎金，如未完成產量定額，則只能按較低的單價來計算工資。列寧把這種勞動組織和工資制度稱為“榨取血汗的‘科學’制度”。——譯者註

② 1950年10月黨中央會議的決議。——原註

說出了越南人民和工人階級的主要願望。

1930年統一會議的“簡要綱領”和中央第一次會議的“政治論綱”，指出了印度支那的革命路線和印度支那人民同工人階級的願望。這些重要的文件武裝了印度支那的共產主義者，使他們能反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綱領（越南國民黨、越南獨立黨、越南青年高望黨等黨派的綱領）。同時，它也是工人階級粉碎封建地主和買辦資產階級欺騙人民的“改良主義”學說（范瓊的“君民公主”學說，阮文永的“直治”學說，裴光昭的立憲黨黨章，吳庭艷的恢復1884年條約的主張等），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改良主義（武庭移的印度支那工業化章程和自治學說。一部分中圻議員的“立憲”學說等……）的犀利武器。我們黨的“政治論綱”和上述其它文件，對指出黨的政策路線、加強黨的統一、建立和鞏固越南工人階級的領導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印度支那共產黨中央機關報“前進報”，在1930年至1931年期間向羣衆進行宣傳和組織人民羣衆的工作中，以及在反對反動和錯誤的政治傾向的鬥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930年至1931年的革命高潮和宜靜蘇維埃

我們黨的成立正是資本主義世界和印度支那進入經濟總危機時期（1929年——1933年）。那時印度支那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工人、職員被解僱，未被解僱者則被降低工資。農民受盡飢餓的痛苦；穀物是他們唯一的收入來源，但價格低賤，此外，還遭受橫徵暴斂，充當俠役。從1929年至1933年，我國不斷發生自然災害，乾旱剛過水災又來，破產的農民日益增

多，不少的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資本家也遭到破產。各階層人民的生活都受到威脅。這就是1930年至1931年革命高潮的物質基礎。但是如果沒有黨的正確領導，那就不可能在羣衆中掀起廣泛的革命高潮。由我們黨領導的1930年的革命運動，是一個工農羣衆的深廣的鬥爭運動。它明顯地體現了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的團結。

1930年2月9日，由越南國民黨領導的安沛起義爆發了。安沛駐軍掉轉槍口起來打擊法國殖民者。1930年2月10日興化和林滄（富壽）的農民、1930年2月15日永保（海陽）和孚翼（太平）的農民相繼起來，響應安沛士兵起義。但所有這些起義都在一個短時期內被法帝國主義鎮壓下去。

我們黨立刻發動羣衆反對白色恐怖，要求釋放因參加起義被捕的戰士，同時提出經濟鬥爭口號，要求改善人民生活。

由我們黨領導，揭開1930年至1931年的羣衆運動序幕的是三千名富連莊園工人的罷工（1930年2月），四千名南定紡織廠工人的罷工（1930年3月至4月）和四百名火柴廠、邊水鋸木廠工人的罷工（1930年4月）等。這些鬥爭，特別是1930年5月1日從河內、海防、南定、鴻基、宜安、西貢、堤岸等地各企業爆發的廣泛的革命鬥爭高潮，逐漸從工廠蔓延到農村，如太平、河南（北部）、宜安、河靜、廣義（中部）、嘉定、堤岸、永隆、沙灘、梂柳、土龍木、美萩（南部）等地。

工人和農民蓬勃、沸騰的鬥爭運動，從1930年初一直延長至1931年底才暫時沉寂下來（以數量計算，1930年工人舉行了九十八次罷工，農民舉行了四百次示威遊行，1931年工人

舉行了三十一次罷工，農民舉行了一百三十五次示威遊行。

1930年至1931年羣衆鬥爭運動的最高峰是成立宜靜蘇維埃。

1930年5月1日，在宜安黨部的領導下，試場火車修理廠和邊水火柴廠工人，以及宜安市附近幾個縣的上萬農民舉行罷工遊行，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減少捐稅，要求發還被強佔的土地，反對白色恐怖。從此，運動洶湧澎湃，席捲宜安和河靜兩省全境。阮豐色、阮德景和黎曰述等同志曾直接領導這一運動。

法帝國主義同封建地主勾結，施行極其殘暴的恐怖政策，它們增派軍隊到這兩個省，到處駐紮，用軍隊和飛機鎮壓羣衆的示威遊行，上千人在鬥爭中被當場打死，上萬人被捕，成千上萬的房屋被燒毀。

但是，在黨的領導下，宜靜人民沒有退縮，一個人倒下去千百人站起來。到1930年9月，帝國主義在宜靜兩省所屬的許多縣、鄉的統治機構被粉碎。許多地方的正總[⊖]把銅印交給幹部；許多地方的知府、知縣逃跑了。宜安省委發出成立蘇維埃的指示（地方工農革命政權的形式）。這個政權實行人民的民主自由權，把土地分給農民，鼓勵人民學習國語字[⊖]，廢除頹風敗俗等等。

帝國主義和封建官吏知道單純用武力無法壓抑越南人民的鬥爭意志，它們便施行新的政策：一方面實行恐怖鎮

⊖ 等於區長職位的偽組織職銜。——譯者註

⊖ 國語字即越文。——譯者註

壓，另一方面用各種狡猾手段來破壞運動。它們依靠地主，首先是依靠官吏和土豪、劣紳，組織了“理仁黨”，其目的是“排除共產黨和挑起對蘇俄的仇恨”^①，分裂黨和羣衆的關係，企圖使羣衆離開黨。同時，它們還唆使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動分子“出版報刊，在教徒中竭力進行反動的宣傳，目的是使我們的兄弟姐妹們互相嫉妒仇恨，從而分裂我們的力量。^②”

他們抓住一些不堅定的羣衆的疲塌心理，用各種手段來欺騙人民，如組織“接黃旗”、“領歸順證”等，企圖瓦解運動。他們還訂出陰險的改良政策，不露聲色地進行破壞革命，如組織所謂賑濟窮民，為在遊行示威時被他們槍殺的死難者做齋祭祀，挖灌溉井，修水利等。

正當革命受到反革命勢力的瘋狂反撲的時候，宣靜地區又遭遇嚴重的飢荒，因而人民羣衆的鬥爭情緒逐漸降低，地方黨委一方面發動羣衆反“恐怖”，懲辦反動分子，另一方面領導農民向富戶要求借糧以解決當前的飢荒。革命從此進入了更艱苦、更複雜的時期，不僅要對法帝國主義和封建官吏進行鬥爭，而且還要和人民內部以及黨內的叛徒進行鬥爭。這時中圻委會提出了“知、富、地、豪，徹底挖根”的錯誤口號，本想以此鞏固內部，但結果反而增加了我們自己的困難。

① 見1930年越南共產黨在宜安散發解釋“理仁黨”的傳單。
——原註

② 見1931年12月17日出版的第26期“前進報”。——原註

黨中央發動全國人民，配合宜靜進行鬥爭，反對白色恐怖，擁護宜靜蘇維埃，同時發出了有關清黨、清會問題的指示。中央曾強調黨當時在農村的階級路線是：“一定要鞏固好貧雇農的關係，因為他們是農村中的半無產者；團結中農，因為他們是目前革命的巨大力量，是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後同無產階級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勞動力。富農分子不僅不能參加紅色農會，更談不到擔任什麼執委職務。但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不同意提出清洗紅色農會，而只提出整頓紅色農會，使它符合組織原則，向富農進行解釋說服，使他們自動退出紅色農會而轉到各個勞動互助組去”[⊖]。

中央的指示，糾正了宜靜黨委的偏差，和反映了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黨在農村中正確的階級路線。此外，中央還指示各地成立自衛隊，以保衛羣衆鬥爭。因此，在宜靜蘇維埃運動中就已經有了由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的萌芽。

宜靜蘇維埃只是在一些地方得到成立，全國雖然進行配合鬥爭，但不普遍，不够强大，敵人仍然有可能集中力量鎮壓宜靜蘇維埃運動。宜靜蘇維埃失敗的原因，當然不止是這些，還由於主觀、冒險，沒有掌握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減敵增友”的策略；在運動轉入低潮的時候，又不懂得進行“有秩序的退却”。

雖然如此，宜靜蘇維埃仍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它確立了印度支那共產黨對越南革命的領導地位。是的，我們

⊖ 摘自1931年1月20日中央關於“擴張紅色農會”的指示。
——原註

黨剛成立就已具有廣泛地發動羣衆的能力，特別是黨已能够發動和領導農民羣衆。宜靜蘇維埃戰士的英勇精神進一步鞏固越南人民不屈不撓的鬥爭傳統。在宜靜蘇維埃運動期間和以後，我們黨雖然受到慘重的損失，但是，在革命鬥爭的烘爐裏，黨受到了鍛煉和學習了為人民而奪取政權的經驗。

在宜靜蘇維埃和全國革命運動正遇到不少困難的時候，1931年3月，中央在西貢舉行第二次會議。這次會議的目的是對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展開鬥爭，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教育和擬訂鞏固革命運動的計劃。會議特別注意同下列的錯誤思想和觀點進行鬥爭：

——把黨看成是一般勞苦者的政黨，而不是工人階級的政黨的觀點。

——關於階級問題的錯誤觀點，把工人階級分成兩類：藍衣類和褐衣類，認為藍衣工人（即技術工人）工資高，沒有革命精神，而工資低、生活最苦的褐衣工人才具有革命精神。

——停止鬥爭以鞏固內部的思想。

除了批判上述的錯誤思想外，會議還強調應該反對黨內的左、右傾。在反左傾方面，主要是反冒險、冒動、不成熟的起義等思想；反右傾方面，主要是反對壓制羣衆鬥爭或當羣衆尾巴的思想等等。

中央第二次會議剛閉幕，中央委員就全部被捕，各級黨委的許多同志也相繼落入敵人手中。但是會議的決議仍能傳達到一些地方。一些錯誤觀點仍然得到糾正。

革命轉入低潮和恢復運動的鬥爭

1930年末，印度支那革命運動進入低潮時期。法帝國主義繼續進行恐怖鎮壓，特別是鎮壓印度支那共產黨，因為它們認為只有消滅共產黨，才能消滅革命。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幹部被逮捕、殺戮、放逐。許多有黨支部和掩護共產黨幹部的村莊被焚為灰燼，同共產黨員有關係的家庭全被監視或跟蹤。不管發生了什麼糾紛，法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都誣賴是共產黨引起的，並傾力進行恐怖鎮壓。與施行恐怖政策的同時，它們還實行欺騙人民的宣傳和收買人心的政策。法帝國主義者鼓勵發展宗教組織，准許在中部和北部成立“佛學”會，並把這些組織置於反動官吏的檢查和指揮下。除了出版有關宗教的、特別是教會咒罵共產黨的書刊外，它們還大量發行一系列的“相術”、“卜卦”、“算命”、“加龍魔”、“催眠學”等迷信的書刊。法帝國主義還為保大籌備“回鑾”和大肆宣傳保大的所謂改革計劃。同時，它們還有意識地助長頹風陋俗，廣設賭場、舞廳、鴉片窟、妓院，加強推廣法國資產階級的沒落文化，企圖使我國青年腐化墮落。

革命低潮的幾個年頭，也是經濟恐慌的重擔壓在越南人民肩上的年頭。各種商品都滯銷，穀物和大米賣不出去，課稅重，公債發行增加。法帝國主義從越南抽出了上億元補貼給在經濟恐慌中的法國壟斷資本家。許多農民破產，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成千上萬的工人失業，本來已是低微的工資，這時又被削減。不少公職人員失去工作。中小商人、小

業主和國內資本家也相繼破產。

在這種情形下，封建地主階級日益投靠帝國主義，因為它們知道，如果離開了帝國主義就不可能維持自己的利益。越南的買辦資產階級仍繼續和帝國主義合作，安於向帝國主義乞求殘羹冷飯。至於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受到排擠，但他們徬徨、動搖和向帝國主義妥協。封建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則提出一些騙人的改良計劃和政治“學說”，以奉承帝國主義和替他們的統治搽脂抹粉，同時，以這種或那種形式來維持或擴充自己的利益。民族資產階級則利用羣衆的鬥爭運動要求進行某些◎改革。

小資產階級則悲觀失望，對革命缺乏信心，一些人還保持他們的幻想和冒險思想，或走上迷信的道路。在這個時期內，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態度，有着相同的地方：他們只向封建勢力進行文化鬥爭，而不敢和法帝國主義進行政治和軍事鬥爭。因此，我們只看到風行着對封建地主階級的過時的和胡作非爲的行動進行消極的抨擊和嘲諷、譏笑的幽默文章（參閱：“風化”、“今日”等報），此外還看到資產階級的浪漫主義文章的發展（“自力文團”等）

環境雖然困難，但我們黨對革命前途仍充滿信心。1932年，黨提出“行動計劃”，重提1930年黨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論綱”和提出三項當前的具體要求：

一、要求給勞動人民民主自由、集會自由、組織自由、言論自由、來往自由、出國自由等權利。

◎ 參閱“準備成立黨和黨的革命綱領”一節。——原註

二、反對迫害政策，反對對政治犯進行報復，立即廢除鎮壓政策和取消死刑的判決，解散刑事臨時法庭和各種軍事法庭等等。

三、取消鴉片、酒和食鹽的專賣權等等。

根據上述三項要求，“行動計劃”還為工人、農民、士兵等提出了具體的要求，這個行動計劃在1932年已獲得共產國際的通過。

在1931年至1932年期間內，我們黨還展開了反對錯誤的政治傾向的鬥爭。首先是1931年在河內火爐監獄中同越南國民黨進行關於革命路線方面的鬥爭。被監禁在那裏的國民黨領袖們曾抨擊我們黨的革命路線，反對我們黨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論綱”。被監禁在河內和峴崙島的我們黨的同志，曾在獄中用秘密出版的報紙同越南國民黨展開辯論，保衛黨的革命路線，保衛動員羣衆的方法，領導羣衆從為日常的實際利益的鬥爭進一步起義奪取政權，同時，揭露越南國民黨的舊三民主義、“種族生存”學說、資產階級民主觀點等錯誤思想。這次辯論使黨的政策、路線取得了勝利，爭取了獄中的一些非黨員和越南國民黨左派分子的同情，使原已分化的越南國民黨，在辯論後更加分化：一些激進的越南國民黨黨員參加了我們的隊伍，一部分人緘默，安分守己，剩下一些反動的充當帝國主義的走狗。

1932年至1933年，一些黨員，利用合法的報紙對“唯物或者唯心”問題展開了辯論，反對潘魁思想——一種否認越南人民革命能力的、無恥的投降思想。這次鬥爭雖然受到限制，只是在合法的報紙範圍內進行，但已取得勝利，並使馬

克思主義在人民中產生一定的影響。

1935年，一些黨員在合法出版的報紙上，開展了“爲藝術而藝術還是爲人生而藝術”問題的辯論，以便反對資產階級脫離羣衆的純藝術觀點。這次辯論也在城市各階層的知識分子和青年中產生了良好的作用。

上述的辯論，擊敗了各種妥協、改良或悲觀失望思想和資產階級的藝術觀點、政治觀點，堅定了黨員、革命羣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黨的唯一正確的革命路線的信心。

在革命低潮時期，大多數黨員被囚禁在監獄裏，但這些共產主義者從來沒有停止過戰鬥。他們組織了監獄支部，爲黨的政策，路線進行宣傳，經常領導要求改善生活而進行的鬥爭，同獄外人民羣衆的革命運動相聯系或配合，反對法帝國主義的野蠻政策。越南共產黨人還把監獄變成革命學校。由於在獄中辦了文化班、理論研究班，和進行對政策、時事的辯論，因此被囚在獄中的共產主義者能够提高自己的理論、政治和文化水平，把自己培養成爲黨將來的骨幹幹部。

從1931年末至1932年初，羣衆運動低落。但從1932年下半年以後，運動又開始逐漸恢復。工人的鬥爭，首先是在南部又爆發了。在那裏，許多工廠的工人舉行罷工（狄斯他林印刷廠工人、毛巾織造廠女工、西貢黃包車工人和由汀莊園工人的罷工等等）。特別是1932年從河內到西貢去的上千農民的反飢餓遊行示威，鬥爭運動漸漸擴大到工人、農民、小商販等各階層人民和西原、高平、諒山等地的少數民族中去。運動還蔓延到柬埔寨和老撾。羣衆鬥爭運動能够恢復的主要原因，是由於黨員與羣衆密切聯系，關心羣衆的生活，並領

導羣衆爲日常生活利益而進行鬥爭。

1932年末，在國外活動的黨員，回到印度支那邊境地區，在少數民族人民中建立了黨的基礎。一些在獄外活動的黨員和從監獄釋放出來的黨員，充分利用合法、半合法和羣衆的一般組織形式，如孝喜會、插秧會、收割會、蓋房子會、足球會、讀報會等重建黨的基礎。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在低潮時期還沒有運用上述策略，仍然採用散發傳單、張貼標語、高懸紅旗等形式進行活動，以致暴露了力量，使敵人又有了實行恐怖鎮壓的機會，因而這些地方的基層組織剛恢復又被破壞。

在這個時期內，一些同志已懂得利用合法的條件出版書報，宣傳黨的政策，競選西貢市議員，並獲得勝利；在進行競選時還巧妙地宣傳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教育了羣衆。但遺憾的是也有一些同志犯了無原則地同托洛茨基分子合作的錯誤，使他們能利用同我們合作的機會在羣衆中建立威信，同時拉攏了我們在南部的一些羣衆。這種合作還在羣衆中造成了思想混亂，使羣衆不能看出托派分子的反革命和破壞革命的行爲，把托派分子和共產主義者混淆起來，不能分別誰是誰非。

在1932到1935年的幾年中，爲恢復革命運動而進行的鬥爭，主要是由於我們黨和我國人民的主觀努力，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有了共產國際，特別是法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

法國共產黨人曾經激烈地反對法帝國主義的吮血政策。在議會裏，在報紙上，法國共產黨人到處都在反對法國殖民

者鎮壓安沛和宜靜革命的行爲。法國共產黨還領導法國勞動人民與越南人民進行配合鬥爭，這些充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的行動，大大地鼓舞了越南人民。

在革命處在低潮的日子裏，中國共產黨經常注意着越南革命情況，同時還想盡辦法幫助越南的革命運動。1934年中國共產黨寫給印度支那共產黨的信曾說：“多少年來，在反對共同敵人的戰鬥中，中國共產黨和印度支那共產黨兄弟般的情誼密切的聯系在一起……。”

在這時期中，蘇聯共產黨為我們黨培養了不少領導幹部。在蘇聯學習的黎鴻峰、何輝集等同志和許多其他在蘇聯得到培養的幹部，當時曾先後到中國和法國，設法與國內取得聯系，以恢復革命活動。

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1934年初，以黎鴻峰同志為首的印度支那共產黨海外領導委員會在澳門成立。它的任務是統一國內黨的組織系統，培養領導幹部，籌備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海外領導委員會還出版了“布爾什維克”雜誌，批判和指導國內的羣衆運動。這個海外領導委員會實際上已負起黨的臨時中央委員會的任務。

第一次代表大會從1935年3月27日至31日，在中國的澳門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代表越南和老撾黨組織的十位同志。

大會解決了下列的共同問題：

1、在各企業、莊園、交通路線和敵人的軍隊中發展黨員，把優秀的工人黨員調到黨的領導機關，並增加這些機關的候補幹部，以鞏固和發展黨，增強黨的力量。

2、爭取廣大羣衆，要特別注意爭取各少數民族、婦女、

士兵和外僑；建立和鞏固共產主義青年團、紅色工會、紅色農會、紅色救濟會、自衛隊；成立反帝統一戰線；利用各種公開合法的或半合法的形式進行活動。

3、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擁護蘇聯和中華蘇維埃，使人民羣衆把這些問題看作是與自己切身利益有關的問題。

大會選出了黎鴻峰、何輝集、馮志堅等九位同志組成的中央委員會。

在澳門舉行的黨代表大會和海外領導委員會的活動，統一了黨的組織系統，和在新的中央委員會領導下統一了越南革命運動。代表大會的決議，給黨員和國內的革命羣衆帶來了信心，為印度支那革命跨進一個更高峰、更有力的新時期準備了條件。

這次代表大會的缺點是沒有分析法西斯威脅世界的危機；沒有提出保衛世界和平、反法西斯、反對戰爭、反對殖民地反動派[⊖]、要求自由民主、和要求改善生活等迫切任務。

黨建立印度支那民主戰線，反對法西斯和戰爭，反對殖民地反動派，要求自由、溫飽和和平（1936年—1939年）

1929年—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和隨之而來的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蕭條狀態，使資本主義體系原有的矛盾更加尖銳化。一些帝國主義的國家已不能像過去那樣用代議民主

[⊖] 指殖民主義者中的親法西斯分子。——譯者註

制來維持它的統治，因此公開建立了金融寡頭的、極端反動分子和沙文主義者的專政，以便瘋狂地鎮壓國內革命，把經濟危機的重擔壓在勞動者肩上，挑起戰爭，以重新分割世界市場和侵略世界的革命堡壘——蘇聯。戰爭的兩個導火線已在歐洲（德國）和亞洲（日本）點燃起來。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1935年7月在莫斯科舉行了第七次代表大會。大會的決議和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報告，都認為：當前世界人民最危險的敵人，不是一般的帝國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者；國際工人階級的任務是：統一自己的隊伍和同各階級、各階層人民組織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戰爭。

共產國際的決議，在世界上獲得了強烈的反響。法西斯主義雖然猖狂，但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運動却更高漲。西班牙的人民陣線，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特別是法國人民陣線曾給予印度支那很大的影響。1936年5月3日法國人民陣線在大選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接着人民陣線政府上台執政。這件事大大地鼓舞了法屬各殖民地的民族。

在印度支那，由於世界經濟危機的後果，由於法帝國主義的欺騙和鎮壓，各階層人民，連民族資產階級和民主人士在內，都感到空氣窒息，希望實行必要的民主改革。

在這種情況下，1936年7月由黎鴻峰同志召集了中央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決議和從當時越南的具體情況出發，會議決定暫時不提出“打倒法帝國主義”和“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等口號，主張成立包括各階級、黨派、政治團體、不同宗教信仰、印度支那各民族的廣泛的

“人民反帝陣線”^①，共同為爭取起碼的民主權利而鬥爭。如：集會自由，結社自由，言論、出版自由，來往、出國自由，釋放所有的政治犯，維護工人的勞動法律，八小時工作制，擴大經濟財政機關、管轄委員會和衆議院^②。

會議強調：要使人民反帝陣線有廣泛的羣衆基礎，必須根據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組織形式來改變羣衆的組織；要盡力地利用合法和半合法的可能性來發動羣衆，掀起一個爭取民主權利的強大的革命運動。在合法鬥爭期間內，黨仍然要鞏固自己的秘密組織並繼續進行秘密的革命活動；在各種羣衆組織中，黨要注意吸收新的黨員等……。

會議還批判了只注意秘密工作而反對合法工作，只知道有工農羣衆而不肯同廣泛的同盟者、各國家革命黨派和改良的民族主義黨派合作的“左”傾保守思想。另一方面，會議也防止：不對黨員和羣衆進行革命的目的是把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印度支那解放出來，和剷除在印度支那的一切封建殘跡的教育，或脫離階級立場，阻止工人對資產階級作鬥爭、農民對地主階級作鬥爭等“右”傾思想。

1936年7月黨中央的會議具有重大的意義，它是越南革命新的發展時期的開始，它的正確的決議補充了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自從這次會議後，我們黨運用了靈活的策略，廣泛地爭取哪怕是微小的、動搖的暫時的盟友，以反對

① 後改名為“印度支那民主統一戰線”。

② 見1936年10月30日出版的“關於印度支那共產黨政策”。

——原註

“殖民地反動派”，利用合法的、半合法的形式對羣衆進行宣傳教育，發動羣衆進行鬥爭。如果說1930年——1931年革命高潮期間我們黨只注重於發動工農羣衆，那末，現在除了仍然重視發動革命的基本力量——工農羣衆外，我們黨還廣泛的爭取除農民以外的其他盟友以成立統一戰線。如果說在1930年——1931年的革命高潮期間，我們黨只是進行秘密鬥爭，那末，現在我們黨已能巧妙地利用合法和半合法的鬥爭形式，使合法的和秘密的工作相結合。這一點，證明我們黨已進一步成長了。

在這個時期中，阮愛國同志在中國。他根據共產國際的決議和國內公開出版的報紙所登載的材料，寫信給黨提出下列幾點的指導意見：

“一、黨（即印度支那共產黨）目前不應提出過高的要求（如獨立、議會等）。這樣做將上了日本法西斯的當。黨應該提關於民主權利的要求：結社自由、集會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和大赦政治犯，為黨的合法活動而鬥爭。

二、要達到這個目的，黨必須大力組織一個廣泛的民族民主戰線。這個戰線不僅包括本國人而且要包括進步的法國人；不僅要有各階層勞動人民，而且還要有民族資產階級在內……”。①

由於黨的正確主張，羣衆運動得到迅速的發展。1936年秋發起的組織印度支那人會就是民主運動的開端。黨一方面不斷地號召各黨派，各個政治組織，各個階級聯合起來共

① 摘自阮愛國同志1939年給共產國際的信。——原註

同行動；另一方面則發動人民羣衆，組織集會、請願，要求擴大民主。運動的發展從城市蔓延到農村，從南部席捲了全國。僅在南部就成立了六百個行動委員會。在北部和中部，運動也極高漲。這時，帝國主義的走狗企圖轉移運動的方向，但遭受羣衆激烈的反對。

在印度支那人民羣衆運動的猛烈發展下和1936年5月法國人民陣線在總選舉中取得勝利的情勢下，法國的統治者被迫讓步。法國人民陣線政府執政幾個月後，在法國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鬥爭運動的强大壓力下，它不得不在印度支那頒行減少工作時間，規定工人在每年的一些例假中工資照發，赦免印度支那政治犯等法令；但另一方面，這個政府却又讓“殖民地反動派”解散各個行動委員會。

印度支那大會被取締，但羣衆的運動不但沒有被撲滅，反而更加發展起來。1936年秋冬，由於法國人民陣線政府頒佈了大赦令，在印度支那成千政治犯出了監獄；黨的許多領導幹部也在這個時候獲得自由。於是我們黨又增加了許多幹部以發動羣衆和領導羣衆運動。

1936年底和1937年，在印度支那出現了要求改善生活、民主自由、結社自由、減免捐稅等羣衆運動高潮。從1936年8月15日至1937年1月15日，在印度支那共有三百三十九次羣衆鬥爭運動，參加者達六萬二千六百二十人，其中僅各企業、手工業的工人罷工運動就有二百四十二次，參加的工人達五萬四千六百二十五人。最重要的是鴻基、錦普礦區和西貢巴遜工人總罷工的鬥爭。在1937年中工人罷工的次數達四百次，最重要的是火車工人的總罷工，與此同時，還有上百次

的農民和各階層人民的遊行示威。同年，黨利用迎接以茹斯丁哥達 (Justin Godard) 為首的法國人民陣綫政府調查團和法駐印度支那最高專員布勒維耶 (Brévié) 來越上任的機會，在各地組織成千上萬羣衆向他們提出要求施行民主改革。這些名義上是迎接他們的行動，實際上是我們黨廣泛地發動羣衆進行鬥爭，使在印度支那的法國統治者驚慌失措。他們千方百計地阻撓運動，但都白費心機。

當羣衆運動正在高漲的時候，黨中央於1937年3月舉行了會議。會議強調必須更廣泛地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性使組織形式更加靈活，不應有任何顧忌，如：取消工會、農會、成立救濟會、愛友會；取消共產青年團成，立印度支那民主青年團^①；取消紅色救濟會，成立平民救濟會。會議主張“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環境，依照公開的和半公開的形式，把所有的羣衆團體組織起來，成立人民陣綫。根據地方的環境組織民主戰綫、聯合行動委員會或擁護法國人民陣綫委員會……。”^②

黨中央在1937年3月舉行會議以後，羣衆運動又有了新的進展。黨的基礎和羣衆基礎得到鞏固和大力發展。黨的各級領導力量得到補充，黨員數量也有了增加。截至1938年3月，黨員增加了60%。羣衆組織方面，在城市中的工人、小

① 各種羣衆組織形式在運動中總的來說是非常靈活的，特別是青年的組織。有的地方組織“先進青年團”，有的地方組織“民主青年團”，但以“印度支那民主青年團”命名的組織最為普遍。

② 摘自黨中央1937年3月20日的通告。——原註

商、小業主等各個愛友會，紛紛成立起來；體育會、閱讀會等也在各地廣泛組織起來。在農村，羣衆的日常生活組織，如：插秧會、收割會、長生會、蓋房子會、出殯會、打獵會、春節食肉會、互濟會、撲滿會^①、儲蓄會等羣衆組織形式，得到廣泛和迅速地發展。在黨的領導下這些各式各樣的組織形式，已把廣大人民羣衆集合起來。由於黨創造性的建議，“國語傳播會”成立了，並發展得很快；掃盲運動成為當時的有組織的羣衆運動。

與各個人民團體迅速發展的同時，羣衆的鬥爭也相繼爆發；進行鬥爭的口號也較切實和具體。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要求施行勞動法，要求自由結社^②；農民進行要求減低人頭稅和減租的鬥爭，反對掠奪土地、當僕役等。多次鬥爭都取得了重大勝利。除了要求經濟權利的鬥爭外，還進行了多次重大的政治鬥爭（如1937年火車工人的總罷工），在全國範圍內起着重大的影響。

黨充分利用合法的報紙雜誌作為鬥爭武器。黨中央機關報“民衆報”、“消息報”和民主青年團的其他用越文或法文出版的報紙，都揭露了殖民主義和半封建的腐朽統治制度，反映勞動羣衆的窮苦生活，經常提出各階層人民要求改善生活和民主改革的願望。

除出版報紙外，黨還出版了許多進步書籍，深入人民廣

① 以撲滿蓄錢的羣衆儲蓄形式。——譯者註

② 一面放棄不合法的工會組織，一面仍要求自由結社。
——原註

泛地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黨的政策。長征、武元甲同志所著的“農民問題”一書，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對越南農民的罪惡行爲大胆地提出控訴，忠實地反映了越南農民的生活和指出越南農民在越南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許多作家受黨的影響，曾經寫出不少有價值的作品，為反對反動和墮落的文化，作出了一定的貢獻。當時，素友同志的詩開始征服了羣衆的心靈。

黨的報紙、書籍的出版活動，是使黨的合法活動和秘密活動取得聯系的媒介，負起黨員和羣衆之間聯系的任務。它在我們黨當時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中佔着重要的地位。

在這個時期中，黨籌備成立印度支那民主戰線。這個戰線除了有公開活動的共產主義者外，還有法國社會黨的法——越分部，“自力文團”，工人、小商、小業主等的各個愛友會。由於有了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黨在中部、北部的選舉人民議會代表的鬥爭中取得了勝利。

在中部，黨實行擴大印度支那民主戰線的組織，連“1884派”[⊖]也爭取過來，所以在1937年選舉人民議會代表時，民主戰線已取得勝利，佔了議長、副議長和秘書的席位。

在北部，由於黨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所以1938年選舉人民議會代表時，民主戰線取得了十五個席位。

雖然選舉工作受到很大的限制，法國統治者又千方百計進行破壞，但在1938年的選舉中，連印度支那經濟委員會和

⊖ 1884派是一個政治派系，它要求恢復法殖民者和阮朝在1884年簽訂的條約而得名。——原註

財政管理委員會（當時在印度支那的最高“民選”機關）的選舉在內，民主戰綫仍然取得了勝利。

然而1939年民主戰綫却沒有在南部的管轄委員會的選舉中取得勝利。因為一方面是由於托洛茨基分子的破壞，歪曲黨的政策，利用達拉第在慕尼黑向法西斯投降和法國人民陣綫政府延遲在印度支那施行適當的民主改革而在羣衆中散播了對黨的政策的懷疑。另一方面，是由於我們主觀，忽視了揭露托洛茨基派陰謀的工作和在某種程度上對下層人民羣衆的工作不够重視。阮文渠同志在“自我批評”一書中（1939年7月20日出版），對在這次選舉中失敗的原因已經作出了正確的分析和吸取了一些經驗教訓。同時，批判了“打倒立憲黨”的左傾主張和不分別進步的或是反動的黨派、階級的“除反動分子以外，應該聯合國內所有的黨派和各個階級”的右傾主張。在這本書裏，阮文渠同志全面地闡述了黨在民主戰綫時期的策略。因此“自我批評”一書，不僅起了糾正當時黨內發生的偏差的作用，而且還是一個總結黨在這個時期中統一戰綫工作經驗的重要文件。

在1936年至1937年的這段期間，黨不斷地取得了勝利，黨的威信日益提高。為了進一步擴大勝利成果，1938年3月，黨中央舉行會議，決定給全印度支那的統一戰綫組織定出一個統一的名稱：印度支那民主統一戰綫（簡稱印度支那民主戰綫）。

會議強調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無論是公開的或秘密的組織都必須服從黨的指揮機關。公開的組織不是一個與中央平行的或相當於各級黨部的

機關。它只是黨的工作的一部分。”[⊖]

會議還向全黨提出必須繼續鬥爭，使黨取得合法活動和增強與羣衆之間的聯系的任務。

執行這個決議，黨發揮了一切潛力，爭取活動合法化和進一步擴大民主戰綫。因此，運動日益强大，不僅工人、農民，而且小商、小業主、學生、職員等參加鬥爭的也日益多起來；罷工、罷課、罷市相繼發生。最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5月1日河內市各階層五萬多羣衆的集會。這次集會，提出了要求民主自由、結社自由、改善人民生活和擁護法國人民陣綫等口號。這個規模巨大的集會，顯示了在黨領導下人民羣衆力量的强大，使殖民地反動派驚悸。成千上萬的人民羣衆舉行各種集會、遊行，與1938年9月16日中折的人民議會的鬥爭相結合，否決了由法國殖民者提出的身份稅的提案。人民羣衆的各個鬥爭，密切地同報紙和在議會裏的鬥爭結合起來，這是1936年至1939年間各個鬥爭取得勝利的條件。

當國內民主運動正在順利發展的時候，世界戰爭的危機日益臨近。日本軍閥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的侵略並直接威脅着印度支那。黨發動擁護中國人民抗日的運動，得到羣衆熱烈的響應。許多地方發動募捐、遊藝籌款、捐獻衣服和藥品支援中國軍隊抗日。同時，黨還提出“守衛印度支那”的口號，並要求法國政府施行各項民主自由權、改善人民生活、大赦政治犯、補助有子弟當兵的家庭等。這時，黨內存在着兩個不正確的主張：“有條件地守衛印度支那”和“無條件

[⊖] 摘自黨中央1938年3月29日至30日的會議決議。

地守衛印度支那”。

第一個主張認為：假使法國不願實現印度支那人名的各項民主要求，則印度支那人將不同法國共同防守印度支那。

第二個主張認為：假使法西斯侵佔印度支那，印度支那人一定要參加抵抗，不必要求法國在權利上對印度支那人作任何讓步。

這兩種主張都是消極的，不是從印度支那各民族的利益和印度支那人必須反對吸血的法西斯以保衛自己生命財產出發的。黨當時正確的主張是：在法國還沒有法西斯化的條件下，黨必須領導印度支那人進行鬥爭，迫使法國同印度支那人共同守衛印度支那，迫使法國實行民主自由、改善生活，使印度支那人積極守衛印度支那。印度支那人必須自己武裝起來抵抗法西斯的侵略，主動守衛印度支那，而不是被動的擁護有條件或無條件守衛印度支那。黨針對上述問題進行了鬥爭，使黨內的思想獲得統一。

在這個時期，爲了維護黨的政策、路線，黨還同不願意與各個改良的民族主義黨派合作的狹隘的“左傾”思想，或不願意利用合法和半合法的條件進行宣傳、教育、組織和領導羣衆鬥爭的保守思想進行了鬥爭。同時，黨對無原則地與托洛茨基派合作的右傾思想，以及不肯注意秘密工作，暴露全部力量的公開主義傾向進行鬥爭。

也是在這個時期，黨除了內部鬥爭外，還經常同殖民政府的鎮壓和收買民心的政策進行鬥爭；同時還要對托洛茨基分子進行鬥爭，因爲這些托派分子千方百計地破壞黨的主張

和政策。當黨主張成立“民主戰線”時，他們却提出成立“工農陣線”的口號；當黨主張成立“民主青年團”時，他們却提出成立“共產主義青年團”；當黨提出“守衛印度支那”的口號時，他們却提出“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國內的革命戰爭”等等。在這些問題上，黨必須無情地揭露托洛茨基派的真面目，使人民羣衆認清他們正是破壞分子，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總之，在民主運動時期（1936年至1939年），黨曾經取得了很大成就。同時，在利用一切合法和半合法的條件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動羣衆為生活權利而鬥爭，發展和鞏固黨和羣衆的組織，密切結合合法的和秘密的活動，在實現革命任務的工作中，也吸取了豐富的經驗。

但在這個時期中我們黨也有一些疏忽的地方，第一，在擁護法國人民陣線政府和守衛印度支那的環境中，對民族問題的提出不够全面；第二，在要求改善人民生活的鬥爭中，沒有提出減租減息作為改善農民生活的鬥爭口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黨建立反
對法西斯侵略的民族統一戰線，把革
命的鋒芒對準帝國主義法西斯和奸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法帝國主義是參戰國之一，因此印度支那也陷入了戰爭的烽火裏。法國統治者在印度支那頒佈了總動員令。各種捐稅、公債、募捐、彩票日益增多；車輛、船隻被徵用；各企業增加工作時

間和降低工資；大批青壯年被召入伍，但是法帝國主義特別注意的是鞏固後方，消滅國內革命力量，好讓他們能够毫無顧慮地進行非正義的戰爭。工農羣衆在民主運動時期（1936年至1939年）爭來的各種最低的民主權利都被取消了。各個民主組織和各個愛友會被解散了，宣傳自由權和集會自由權也被取消。黨的各個合法的新聞機關遭到搜查，機關人員被逮捕，財產被沒收。恐怖、殘殺行爲又在各地出現。僅在1939年9月份內，在北部就發生一千〇五十一宗搜查和逮捕的事件。

當德法戰爭剛爆發和法國共產黨被宣佈為非法的時候，黨立即向正在進行合法或半合法活動的各個機關和幹部發出指示，要求必須迅速地轉入地下活動，因而一般來說，黨保全了自己的力量。但是，由於敵人的迫害政策而造成的損失也不算少。

面對着被敵人進攻以及蘇聯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情況，黨內和黨外的一部分人感到徬徨、動搖。為了克服這種情況，黨在1939年9月29日發出了關於“目前的政治道路”的通告，北圻黨委也出版了一本“蘇聯永遠忠誠於和平”的小冊子，以解釋蘇聯始終如一的和平政策，使黨內對當前形勢和黨的當前任務在思想上和認識上趨於一致。同時黨決定把活動的中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這個主張非常重要，因為農村是敵人統治機構比較鬆弛的地方，使黨更加有條件同農民羣衆密切聯繫，進行宣傳和組織農民；把農村變成革命根據地。正由於活動方向的轉移，所以儘管受到敵人瘋狂的迫害，但革命力量仍然沒有遭到像1930年至1931年時

期那樣的破壞。相反的，還在千百萬勞動農民中生了根，使革命運動日益壯大。

但是，世界大戰的爆發要求要有符合新形勢的主張、政策。由黨的第三任總書記阮文渠和潘登流、黎筭等同志主持的黨中央會議在1939年11月舉行，會議決定建立印度支那反帝民族統一戰線，以團結印度支那各階層人民、各個階級、各個民族，把革命的鋒芒指向民族的敵人——帝國主義法西斯。

會議認為，反帝和反封建的任務，是越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個基本任務。但是在當時的形勢下，民族的危機成爲最嚴重。“站在民族解放立場上，以民族的利益爲至上，革命的一切問題，包括土地問題，都必須從這個目的出發來加以解決。因此在主張建立印度支那反帝民族統一戰線時，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現階段只是沒收背叛民族利益的地主的土地”。①

會議還認爲，帝國主義戰爭和法西斯統治，將會激起人民的憤恨和革命的爆發。會議的一個重要的主張是進一步成立印度支那民主共和政府，取消“建立工農兵蘇維埃政權”的口號。

會議還決定從各方面來鞏固黨，使全黨在意志上和行動上都統一起來。

1939年11月舉行的黨中央會議，標誌着越南革命運動的轉折點。

當越南人民正在爲實現黨的新主張而進行鬥爭的時候，

① 摘自1939年11月中央會議決議。——原註

世界和國內形勢接連有了許多轉變。1940年6月，法國被德國法西斯佔領。1940年9月，印度支那被日本法西斯侵略。法國殖民者向日本法西斯投降，俯首讓日本軍隊進佔印度支那。但是具有不屈的鬥爭傳統又得到黨的教育的越南人民，接連地奮起反抗法、日帝國主義。1940年9月22日日軍進攻諒山。法軍敗走，經北山退返平原地區。1940年9月27日，北山人民在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下起義，提出抵抗法、日帝國主義的口號，奪取法國敗軍的武器來武裝自己。當起義正在繼續進行的時候，日、法帝國主義已經互相妥協，使法國殖民者有條件進行鎮壓越南革命。北圻委派陳登寧同志到北山，直接指揮起義。北山人民在武凌舉行集會，討論成立革命政權。由於缺乏經驗和不够警惕，因而遭到法軍的圍擊。起義軍撤入森林，成立了由我黨領導的越南第一支游擊隊。

爲了響應北山運動，一些地方在接到中央的指示後，曾經起來進行配合鬥爭，特別是在清化省石城縣的玉朝鄉還發展到武裝鬥爭，但後來被迫分散在人民中。

北山起義雖然失敗，但它對日、法法西斯的陰謀却已揭露無遺，並且產生了自我們黨領導革命以來的我國人民第一支武裝力量。這支武裝力量後來逐漸發展成爲“越南救國軍”。北山起義已爲越南人民的武裝鬥爭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页。北山起義爆發時，國內各地人民還沒有來得及準備，因此起義軍只好單獨地戰鬥。但是北山起義的經驗教訓給後來八月總起義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與日軍進入越南北方的同時，泰國軍隊也攻入柬埔寨。法國殖民者強迫越南人民，特別是南部人民和柬埔寨人民到

前綫去給他們充當砲灰。蘊藏着對法國殖民者的仇恨以及不願當日、法帝國主義的奴隸的人民，受到北山起義精神的鼓舞而奮起進行鬥爭。

當時，一部分中央同志，如阮文渠、黎鴻峰、何輝集、黎筭等同志都相繼被捕。一些還留在南部的中央同志和南圻委打算領導南圻人民起義，把法暹^①戰爭變為革命內戰，並派潘登流同志北上參加中央第七次會議和就這個問題向中央請示。1940年10月，會議在北寧舉行。出席會議的有潘登流、黃國越、黃文樹、長征、陳登寧等同志（還有一部分中央委員在南部因工作關係沒有出席會議）。

中央第七次會議分析了世界和國內形勢，指出了印度支那各民族正遭遇到“一個脖子被勒上兩條繩索”的危險，確定了反帝民族統一戰綫是反對日、法法西斯的民族統一戰綫，並且肯定了中央第六次會議提出的暫時取消“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的口號的正確主張。

會議認為，印度支那人民的革命高潮就要到來，黨必須領導印度支那各民族準備進行武裝起義，爭取自由和民族獨立。^②

會議還聽取陳登寧同志所作有關北山起義的報告，並且決定要維持北山武裝力量，成立各個游擊小隊進行分散活動，進而以北山——武淵為中心區建立游擊根據地。

關於南圻委的提議，會議認為，由於北山起義已經失敗，南圻以及全國範圍內的起義條件還沒有成熟，因此不應

^① 暹即泰國。

過於急躁；南圻委目前的任務是採取政治和經濟的鬥爭形式來反對法國殖民主義和日本法西斯，反對法暹戰爭，同時大力宣傳、教育、組織人民羣衆，特別是工人、農民和士兵，做好準備工作，等待良機進行打倒法、日的武裝起義。如果立即起義就將會處於孤立和有被法、日軍隊聯合起來消滅的可能。

當陳登流同志回到南部時，獲悉起義的命令已經下達各地。各地也作好了準備，命令已無法收回。1940年11月23日夜間，南圻起義爆發了。由於在還不能夠直接發動革命的情況下而爆發革命，起義計劃又被洩漏，因此南圻起義遭到失敗。法帝國主義進行了極其野蠻的殘殺。但是越南人民並沒有因此而退縮。南圻起義的烈火還沒有熄滅，都良（宜安省）的士兵又舉行起義。

北山、南圻、都良的起義雖然沒有取得勝利，但是它發揚了越南人民英勇不屈的精神。多少的頭顱和鮮血給我們黨和我國人民留下了關於武裝起義的無比寶貴的經驗。這些經驗可以總括成如下幾點：

第一，一個奪取政權的起義要取得勝利，必須在適當的時機爆發。這就是在形勢上已經能進行直接革命的時候，它表現在：甲、敵人已經徬徨和分裂到了極點，他們正遭遇到困難、驚惶失措至極點而無法克服；乙、各個中間階層已經憎恨敵人，傾向革命，或者對革命有好感，隨時準備跟隨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走；丙、先鋒隊已具備犧牲的決心，決心領導全民戰鬥到底，以消滅敵軍，解放自己的民族。

第二，像我國這樣的一個殖民地和農業國家，奪取政權

的武裝鬥爭路綫應該是：起義軍要攻佔敵人在農村最空虛的地方，在農村建立根據地並逐漸使之擴大，然後等到條件許可時才在城市舉行起義，消滅敵人的各首腦機關，收復全部國土。

第三，起義要取得勝利，不能只依靠由我們感化了的敵人的士兵力量，主要必須是依靠廣大的人民羣衆的力量，首先是依靠工人和農民羣衆；同時，必須大力向敵人士兵進行宣傳，使他們覺悟和不願向革命軍開槍，或者投奔革命軍隊伍，用敵人的槍來射擊敵人的腦袋。發動兵變只有當它得到後方廣大人民羣衆的積極支持和響應的時候，對革命才能够有實際的效果。

世界和國內日益緊張的形勢，要求我們黨必須加強領導。1941年2月，阮愛國同志回國召開中央第八次會議。會議於1941年5月10日到19日在緊靠中國邊界的北坡（高平省）舉行。出席會議的有阮愛國、黃文樹、長征、黃國越、范文同、黃文歡等同志。

會議認為，自從印度支那遭到法、日法西斯的雙重壓迫以來，印度支那各民族與帝國主義侵略者之間的矛盾成為了最主要的矛盾，因為“壓迫過於沉重，印度支那各個民族不能再忍受；法、日帝國主義者不僅壓迫工人和農民等階級，而且還壓迫整個民族……。其他各個階級的權利都被剝奪，民族危亡的命運比任何時候都更嚴重”。因此，會議強調指出：“在這個時候，局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必須置於民族問題之下。不能為整個民族爭取到獨立、自由，那麼不久整個國家民族將永遠過着牛馬的生活，而且連局部的、階級的

利益在萬年後也不能够要求得來。”○

爲了集合各階層廣大人民和各個民族的革命力量，以反對民族的主要敵人——法、日法西斯，會議主張成立越南獨立同盟會，即“越盟陣綫”，這個名稱充滿了意義和容易動員羣衆的民族精神。

會議高舉了民族解放的口號，各個羣衆組織的主要目的是爲了救國，因而各個羣衆組織的名稱也統一稱爲“救國會”。

關於土地問題，會議認爲，爲了進一步分化地主階級，仍舊需要繼續執行暫時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的口號，同時提出了：沒收帝國主義和越奸的土地分給貧苦農民。減租減息，重分公田，進而實現耕者有其田等口號。

會議還決定促進各方面工作，爲武裝起義做好準備，並加強對各個武裝組織的領導和建立游擊根據地。

1941年5月中央會議的上述各個主張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會議的決議標誌了黨在集中鋒芒反對法西斯侵略的問題上的一個有力的轉變。它動員了全國、全民起來驅逐日、法法西斯，並且已引導越南革命運動取得了1945年八月革命的勝利。

會議健全了中央委員會的組織和選出了長征同志爲總書記。

中央會議召開後，越盟陣綫正式成立（1941年5月19日）。

黨和越盟陣綫當時的中心任務是救國、解放民族。因

○ 摘自1941年5月中央會議決議。——原註

此，越盟陣線中的各個羣衆組織都重新組成了各個救國會，如“工人救國會”、“農民救國會”、“婦女救國會”、“青年救國會”、“自衛救國會”、“兒童救國會”、“父老救國會”。此外還成立“越南救國會”以吸收贊成抗法、驅日的資產階級和地主。

爲了加強對武裝力量的領導，中央指定馮志堅同志、黎文芝（即輝）同志和朱文晉同志在北山——武淵組成各游擊隊的指揮部，取名爲“越南救國軍”。1941年秋季，“救國軍”編爲兩個中隊：一中隊由馮志堅同志指揮，駐在諒山省的北山。另一中隊由朱文晉同志指揮，駐在庭哥、長舍（太原省武淵縣）。1941年年底，在北山的“救國軍”經由北𣴓省的那黎開往高平省，中途被伏擊損失慘重^①。駐庭哥、長舍的中隊進行了連續八個月的游擊活動（由1941年7月到1942年2月），而且是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作戰，但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的力量和消耗了敵人的力量。最後，由於接濟困難，只好“化整爲零”，分成了各個武裝工作組在太原、宣光等省的所屬各地和北𣴓、河江兩省的部分地區，深入羣衆進行宣傳，進行活動。

八個月來在北山、武淵所進行的游擊活動，給我們提供了關於武裝鬥爭的經驗教訓：在日、法法西斯的雙重壓迫下，我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是能够建立革命根據地、進行長期游擊戰和消滅比我們强大得多的帝國主義的，但是必須

① 馮志堅同志已在這次戰鬥中犧牲，黎文芝同志被捕並已在高平監獄中犧牲。——原註

有廣泛的羣衆基礎，以便於游擊隊的活動和發展。游擊戰爭的規律是依靠羣衆，生根發芽，高度機動，變化無窮。如果游擊隊只採取守勢、自己收縮和脫離羣衆，那麼就將會被消滅。如必要時，應“化整爲零”，保證能深入羣衆，與羣衆打成一片，以克服困難，建立基礎，然後等到條件具備時再集合起來恢復作戰。

游擊戰爭是在我們黨領導下的反對日、法法西斯的越南革命的一種新的鬥爭形式。

蘇聯抵抗德國法西斯的衛國戰爭對越南和世界革命運動有着強烈的影響。越南人民把蘇聯軍隊的每一個勝利看作是自己的勝利。1942年底和1943年初，蘇聯軍隊在斯大林格勒消滅了三十三萬德國法西斯軍隊和在所有各個戰線上展開了猛烈的反攻。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勝利大大地鼓舞了越南人民，同時也狠狠地打擊了日、法法西斯。儘管在日、法法西斯雙重壓迫下過着痛苦的生活，但是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本來已具有信心的越南人民，現在對自己的解放事業更加增強了信心。

日本越來越加緊排擠法國，日本和法國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化，兩個統治者之間的衝突已經無法避免。日本法國之間的矛盾，戴高樂與法國法西斯分子之間的矛盾，以及親日派與親法派之間的矛盾等等……越來越尖銳。

面對着形勢的轉變，中央常務委員會在1943年2月25日到27日舉行會議，決定鞏固和擴大民族統一戰線（越盟）和籌備成立印度支那民主戰線，爭取在印度支那反對法西斯的外僑，主要是參加抗戰的法僑和抗日的華僑，同時積極準備

起義。會議強調指出“準備起義是當前的中心工作。”①

會議舉行後，全黨積極為實現上述的主張而奮鬥。

1942年8月29日，阮愛國同志到中國去工作，被蔣介石政府逮捕監禁，直到1943年9月16日才獲得釋放。釋放後，他立即同“解放會”——越盟陣線設在雲南的一個組織聯系，同時，還同山越南人在中國成立的、在廣西進行公開活動並被阮海臣、阮祥三和武鴻卿等人壟斷的一個抗日、反法組織——“越南革命同盟會”建立合作關係。“越盟”和“越南革命同盟會”之間的聯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當時，阮愛國同志用胡志明的名字進行活動。

在國內，執行中央常務委員會1943年2月的決議，黨加強活動以擴大統一戰線，努力爭取大學生、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當時，在上述這些階層中有了分化：一部分親日，一部分親法和一部分擁護“越盟”。親法分子越來越少；一些過去認為可以利用日本的人也越來越認清日本帝國主義的法西斯面目而感到失望；“越盟”的影響則越來越擴大。黨認為必須幫助越南民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建立一個革命政黨的時候已經到來，以便爭取越南民族資產階級和越南知識界站到越盟陣線這一邊來。這樣一面既可以粉碎日本帝國主義在越南的“大東亞”欺詐政策，另一方面又能進一步擴大反日、法法西斯的民族統一戰線。因此，黨幫助楊德賢的大學生派和“清議”派②，建立了越南民主黨

① 摘自1943年2月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決議。——原註

② 有民族資產階級傾向的一種進步雜誌名稱。——原註

和參加了越盟陣線。

我們黨還主張動員反法西斯的民主外僑，包括在印度支那的法國戴高樂分子，建立印度支那反法西斯民主戰線，同時，積極在越南士兵，外籍僱傭兵和法國士兵中展開活動。

由於黨上述的正確主張，“越盟”威信日益提高、影響日益擴大，越南革命運動也日益發展。日、法法西斯感到只用鎮壓和恐怖迫害政策不可能將越南革命火焰撲滅，因此他們復興頹風敗俗，傳播改良的反動思想，誘惑青年參加他們所謂“為服務而健康”的運動，企圖使青年遠離革命的道路，同時為他們驅使青年當兵創造有利條件。日本帝國主義利用“越大”派作傳聲筒，為他們宣傳“聯亞”論調，藉此拉攏羣衆。

一些獲得合法出版的書報上，充滿了浪漫、墮落、悲觀失望的詩歌和文章。托洛茨基分子的寒暄出版社發行了所謂具有“研究”性質的書籍來歪曲馬克思主義，企圖利用曲解唯物主義學說和階級鬥爭學說的手法，“在理論上擊破”“越盟”的民族、民主和愛國主義思想，同時污蔑越南民族的整個解放鬥爭歷史。

為了反擊上述這類“文化”，1943年黨的“越南文化提綱”誕生了。“提綱”指出越南的新文化必須具有三大性質：民族、科學、大眾和由黨領導。提綱提出當前的任務是要“反對法西斯、封建、落後、奴役的文化以及愚昧人民的文化。發揚印度支那的新民主主義文化”。這個提綱不僅提出了當前的任務，而且還指出了全黨的長遠奮鬥的方向：根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來建立越南的新的文化事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黨和越盟陣綫出版的地下書報非常豐富：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旗”、越盟陣綫中央機關報“救國報”、越盟陣綫在高一一北一一諒的宣傳鼓動機關的“越南獨立報”、中圻圻委的宣傳鼓動機關的“破鏡報”、南圻越盟的宣傳鼓動機關的“解放報”等等。除了報刊以外，黨和越盟陣綫還出版了一些通俗的宣傳小冊子，以及一些學習時事、政策、游擊戰爭或工作經驗的書籍。這些書報曾經負起了同敵人進行政治和思想鬥爭的重大使命，同時也在黨內部和越盟陣綫內部展開了思想鬥爭，保證了黨和越盟陣綫的路線、政策的勝利。

單在黨的工作方面，當時的問題是在思想和組織方面來鞏固黨，克服那些分裂、宗派的趨向，維護黨組織的純潔和健全，慎重地發展黨，提防A.B[⊖]分子潛入黨內從內部進行破壞。

1941年5月召開的中央會議曾強調：培養幹部已成為目前迫切的工作，決不能有一時一刻的放鬆。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必須特別重視這項工作。”因此，經常地開辦一些短期訓練班，以訓練和培養幹部。有關秘密工作、機關組織工作、交通聯絡組織工作等，也總結成經驗來向幹部、黨員推廣。

1943年，在黃文樹同志被法國法西斯逮捕和槍殺以後，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發展一批新黨員，以“黃文樹班”為名，

⊖ A·B·是“Anti-Bolshevik”的簡寫。法帝國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反布爾什維克”組織的簡稱，目的在於破壞我們黨。——原註

吸收了許多優秀分子入黨，進一步加強越南革命的領導力量。

關於反A.B分子的工作方面，在北部，黨已經破獲了由阿功主謀，企圖拉攏折委中的一些懷有不滿情緒的同志以反對黨中央、在黨內搞宗派的一宗破壞案件。

中部是A.B分子丁文易活動最利害的地方。中央號召在中部的同志們提高警惕進行反A.B，同時指出：“中折的A.B分子披着革命和共產黨的外衣，欺騙同胞，偵查愛國人士，破壞革命組織。他們還千方百計散播謠言，分裂革命隊伍。”^①清除掉A.B分子就是為黨挖掉了毒瘤，使黨的肌體健康。

除了反A.B分子的工作以外，在這個時期內黨還必須在內部展開反對分裂、宗派活動的鬥爭。在北折，自從黨中央第八次會議以後，黨又要為清除中折折委中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的萌芽進行鬥爭（1941年）。在南部，黨為“前鋒”和“解放”兩派的統一進行鬥爭（1945年）。在中部的同志也進行鬥爭以克服起源於邦美蜀監獄中山於觀點相背而產生的宗派思想。

毫無疑問，通過上述各次內部的鬥爭，黨已進一步獲得鍛煉和更加穩健了。

關於統一戰線工作方面，黨一方面重視擴大越盟陣線，團結各階級和各階層人民，甚至爭取一部分地主和中立其他一部分地主。但是，另一方面黨也重視發展工農力量的組織

^① 參閱1943年8月26日解放旗報第八號。——原註

問題，使工農聯盟成為越盟陣線的牢固基礎，並且積極在敵人士兵中進行活動。通過實現統一行動來反對民族的共同敵人工作，黨切實地擴大了越盟陣線。工人發動的要求加薪、減少工作時間、廢除扣罰等的多次鬥爭，已經推動了工頭和文書等人參加。農民的鬥爭運動也爭取到富農和小地主的參加與支持，如：反對徵收穀物、反對強迫拔掉稻子種芋蔬和拔掉玉米種莧蔬子、反對日軍搶掠市場、反對拉伏拉丁等的鬥爭。在羣衆運動壯大的地方，還出現了具有半武裝的鬥爭形式，如：打擊騷擾的日軍、消滅越奸等……。有的地方出現了有武裝自衛隊掩護的宣傳活動或羣衆鬥爭。

在建設武裝力量方面，黨大力發展各個救國自衛隊，同時努力維持一些“越南救國軍”中隊，成立各個武裝宣傳隊和重視購置武器問題，為起義做好物質方面的準備。

當時，蘇聯軍隊已在許多戰線上向德國法西斯軍隊反攻並取得了勝利。消滅法西斯軍隊只是時間問題而已。1944年5月7日越盟總部根據黨中央的主張發出準備總起義的指示，以促進運動的進一步高漲。1944年8月10日，黨中央發出“購買武器，趕走共同的敵人”的口號。統一戰線中的各個羣衆組織熱烈響應捐款。同時，越盟總部發行了“信用票”作為準備起義的經費。熱騰騰的革命氣氛蔓延各省。特別是在北山——武淵兩個根據地和高平省，起義準備工作更加熱烈，各階層人民都踴躍參加。1944年11月13日晚上，當地黨組織領導了庭哥（太原省武淵縣）人民起義。這次起義的爆發是出於中央的計劃之外的。正當日、法法西斯日益分裂和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連續戰敗的時候，本來應該積蓄力

量，等待時機，等待總的命令以便在全國範圍內發動起義，但是當地黨組織却自動發動局部起義，這樣等於自己暴露自己的力量，把自己陷於孤立境地中。獲悉起義爆發的消息後，中央常務委員會已及時批評和決定把起義轉為地方的游擊戰爭，採用伏擊，襲擊等形式來擊破敵人的搜索森林和掃蕩的計劃。然而，庭哥起義和繼着進行的游擊戰爭，已經轟動了全國，鼓舞了各省的“購買武器趕走共同的敵人”的運動和使敵人士兵更加驚惶慌張。

正如武羅人民一樣，1944年冬季，高平、北𣇗、諒山等省人民懷着對帝國主義高度的憎恨心情，隨時準備着發動武裝起義。當起義槍聲將要響起來的時候，阮愛國同志從中國回國，他指示延遲起義日期，因為：

“一、起義的決議只是根據高——北——諒的地方情況，而不是根據全國的情況，即只看到局部，沒有看到全面。

二、在當時的條件下，根據聯省委員會決定的規模來發動游擊戰爭是必然要遭受失敗的，因為帝國主義將集中全力來鎮壓。因此，必須採取更靈活的武裝鬥爭形式，政治比軍事更為重要，在進一步鞏固政治的基礎上，先大力把運動向前推進後再說。”①

根據阮愛國同志的提議，依靠在高平的武裝力量，於1944年12月22日成立“越南解放軍宣傳隊”，目的在於發動一個從高平伸展到平原地區的武裝鬥爭運動。由武元甲同志

① 摘自武元甲同志著的“解放區”一書。——原註

指揮的“越南解放軍宣傳隊”剛出發就在1944年12月24日和25日先後攻克了芬克、那銀兩個敵人的駐防所。為越南人民的武裝鬥爭開闢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阮愛國同志的英明主張使高平省避免了重大的損失，並且促進了高——北——諒革命運動的高漲和穩固。

黨發動抗日救國高潮， 準備總起義和總起義勝利

一、如我們黨所預料，日本法西斯和法國殖民者之間的你死我活的衝突已發生。1945年3月9日，日本法西斯發動政變，踢開法國殖民者，獨佔印度支那。不到四十八個鐘頭，印度支那全境的法軍便向日寇投降，或逃亡到中國和泰國。過去，法國殖民者對越南人民那麼蠻橫殘酷，如今在日寇面前却那麼卑賤怯弱。

相反地，越南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却英勇地抗日。就在日、法互相火併的日子裏，越南共產黨人和越南人民已經有了令人欽佩的果敢行動。我們的游擊隊迅速地攻下了敵人的朱市、屯市、山陽、大慈等據點。一些青年救國組織和農民救國組織的成員不花一粒子彈就攻下興安省據點。在義路監牢的政治犯起義，分散到各地方繼續進行革命活動。在山羅和其他各地的政治犯，利用日、法間的矛盾，實現了以和平辦法解放自己。在廣義省巴德的政治犯配合士兵起義，繳獲敵人全部武器，並組成巴德游擊隊。這股力量後來成為第五聯區人民軍隊的核心。

日寇發動政變的前幾天，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當時駐在河內市郊，已接到了情報：日軍已接到準備隨時作戰的命令，法駐印度支那最高專員戴古已被日方召赴西貢，並被強迫承認可恥的投降條件。

就在1945年3月9日晚上，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立即在北寧省慈山縣亭板村舉行擴大會議[⊖]，以分析當前形勢和提出目前的緊急任務。

會議清楚地分析了“政變”的原因，估計法軍必然失敗，日軍將暫時取得勝利，並指出日本法西斯主義和親日傀儡將無法鞏固它在印度支那的政權。相反地，這次的“政變”却造成了政治危機的更加深刻化，促使武裝起義條件迅速達到成熟。促進在印度支那起義條件成熟的良好機會是：

(一) 政治危機的深刻化，敵人無暇對付革命運動。(二) 嚴重的飢荒正在發展，羣衆對侵略者極端憎恨。(三) 世界大戰已到了激烈和決定日本法西斯命運的階段。因此，會議認為這種情況是起義的前奏，我們黨當時的直接任務是領導全民進行總起義。

會議還認為：敵人的隊伍和革命的同盟軍已有了變化：日本法西斯是印度支那人民的“主要敵人，目前具體的敵人”；被日寇打倒的法帝國主義，已失去了在印度支那的統治地位，已經不再是印度支那人民的具體敵人了。雖然印度支那人民“仍然要提防戴高樂之流企圖恢復法國在印度支那的

⊖ 當時不能召開中央全體會議，因為在高平和在中國進行活動的一部分中委同志不能回來。——原註

統治地位”^①的活動，但抗目的法國人，這時候却成爲印度支那人民的“客觀同盟軍”。

因此，會議決定將“打倒日法法西斯主義”的口號改爲“打倒日本法西斯主義”，並提出了“成立印度支那人民革命政權”的口號，以反對日寇和親日賣國的越奸傀儡政府。

會議還決定改變宣傳、鼓動、組織和鬥爭形式以適合起義前夕的形勢，尤其是必須領導人民武裝起來打開帝國主義者的穀倉以解決飢餓問題，動員廣大人民羣衆參加示威遊行進一步實行總起義，哪裏有條件就在那裏發展游擊戰爭，奪取地方政權。會議決定“發動浩大的抗日救國運動，作爲總起義的前提”並準備當條件具備時隨時舉行總起義（比如：日寇向同盟軍投降或同盟軍迫近和開入我國境內等）。

上述這些英明的分析和重要的決議已在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的關於“日、法火併和我們的行動”的指示中清楚地指出。這個指示是我們黨和越盟陣線在1945年3月至8月這個時期中一切行動的指南。我們可以說：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在1945年3月9日至12日舉行的擴大會議和黨中央常務委員會1945年3月12日的指示對八月革命的勝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根據黨中央三月的指示，1945年4月16日越盟總部又發出了關於組織解放委員會的指示，這是一個包括各級：企業、鄉、縣、省、市、特別區、坊的“政府前身”的形式，而全國則成立越南民族解放委員會，就是越南革命臨時政

① 以上這些都摘自中央常務委員會的指示：“日法火併和我們的行動”。——原註

府。按照越盟總部的指示，解放委員會只是担负在起義前一段時期的工作任務。當在總起義時則解散解放委員會，在企業中成立工人革命委員會和在地方上成立人民革命委員會。越盟總部1945年4月16日的指示，對建立革命政權和為人民準備在總起義勝利時掌握政權已起了作用。這個指示到達各地方，各地方的解放委員會立即出現，並得到羣衆的熱烈擁護。當時，在成立解放委員會的地方，都同時存在兩個政權形式：解放委員會和地方偽政權機關。

從1945年4月15日至20日，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舉行北圻革命軍事會議，決定劃分各個戰區^①，統一各武裝力量，把越南救國軍、越南解放軍宣傳隊和其他武裝組織，組成越南解放軍，發展各個武裝自衛隊和戰鬥自衛隊，加強游擊戰爭，開辦抗日軍政學校為總起義培養幹部。會議決定由武元甲、朱文晉、文進勇等同志組成北圻革命軍事委員會。這次會議所通過的“迎接總起義”的決議，獲得黨中央批准。

自北圻革命軍事會議召開以後，軍事活動日益擴大，在一些地方由武裝宣傳、除奸、滅偽等活動，發展到成立自鄉至省的革命政權。至1945年6月4日，包括高平、北𣴓、諒山、太原、宣光和河江^②六個省的解放區正式成立，在那裏

① 各戰區如下：黎利戰區（北部），黃花棟戰區（北部），光中戰區（北部），陳興道戰區（北部），潘庭達戰區（中部），徵仄戰區（中部），阮知芳戰區（南部）。——原註

② 地方華族慣稱河陽，是譯音之誤。現照原文作河江。

——譯者註

的各級人民委員會也成立起來，越盟的政策開始得到施行。解放區已成爲全國主要的革命根據地，同時也是新越南國家的縮影。

越南解放軍和戰鬥自衛隊日益活躍。在朱市、楔嶺的伏擊戰和消滅三島敵軍據點之戰震撼全國。1945年6月8日，在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下，東潮的人民起來解除在東潮、至靈、冒溪、場向等地敵人的武器，推翻偽政權，成立人民革命委員會，組織了抗日游擊隊和開闢了東潮戰區。

在中部，巴德游擊隊仍然活動和發展。

在南部，美萩，後江地區的革命運動在發展。

這時候，黨特別重視報紙和其他形式的宣傳工作，以消除受日寇所散播的壞影響，粉碎親日、恐日和利用日寇的思想。

黨無情地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以及復越、復國、大越、國民黨、托洛茨基等親日分子的欺騙手段。揭露這些朝秦暮楚之流所提出的虛假的獨立口號和用日本帝國主義的“外交聯合、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交流、政治獨立”的欺騙人民的大東亞計劃。黨還給人民清楚地指出：“……相信日本帝國主義是自殺。跟親日越奸分子走就等於飲服戕桑惡獸的毒液。對日寇只有全民一心，拿起武器來抵抗。”①

黨批判了一些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主張改組陳仲金政

① 指日本帝國主義。——譯者註

② 摘自“共產主義”雜誌第三期的“日寇對我國人民的政策”一文。——原註

府，希望採取與日本和平協商的辦法取得“獨立”，通過親日傀儡政府頒行“君主立憲憲法”的錯誤思想。黨認為這種傾向非常危險，因為它給日本法西斯抹脂搽粉，轉移我國人民的注意，使我國人民對日寇產生幻想，模糊了人民對日寇和親日傀儡政府的認識。

黨中央還批判了前鋒報（南部後江）中的一些同志，在1945年3月9日日軍發動政變前自行取消反對法國法西斯的口號（以後又主張利用日本“奪取政權”）的右傾思想。同時，黨中央還批判了解放報（南部前江）中的一些同志，在日寇發動“政變”勝利後，實際上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權力已經不存在，而仍然保持“打倒日、法法西斯主義”的口號的“左”傾思想。上述這兩個報紙的觀點都是錯誤的，然而，它們之間却以極其尖刻的口氣互相攻擊。黨中央指出了雙方的錯誤並號召南部的同志遵循中央的口號和停止閹宗派的分裂現象，團結起來嚴正地執行黨的政策、路線。①

以上這些思想鬥爭和宣傳工作，目的是為了使全黨全民團結一致，集中力量於當前的目標：總起義奪取政權。

正當準備總起義的時候，北部和中部以北各地遭到一場恐怖的飢荒，威脅着成百萬人民的生活。這是日、法法西斯的剝削和發動戰爭政策所造成的後果。黨提出“打開穀倉，解決飢荒”的鬥爭口號，並把它看作是發動羣衆的中心口號，使成百萬羣衆出來遊行示威，作為羣衆進行總起義的演

① 參考“解放旗”雜誌第15期的“應該迅速跟着黨的路線走”一文。——原註

習；大膽發展越盟陣線中的各個救國組織，發展“羣衆的政治隊伍”以準備決定性的衝擊：總起義奪取政權。上述口號完全符合於當前羣衆爭取生存權利的需要，獲得羣衆的熱烈擁護和踴躍參加。實現打開穀倉的鬥爭，在北部和中部的許多鄉村相繼發生和日益擴大。在日常的鬥爭中，黨沒有忘記把經濟鬥爭的口號與政治鬥爭的口號結合起來，其中包括打倒日本法西斯，奪取政權歸還人民的口號。

與以上鬥爭展開的同時，還進行除奸、滅偽、除流氓、警告官吏及鄉間的偽組織走狗、不繳糧、不納稅給日寇，在各市集、渡口、企業、學校、戲院等處舉行突擊演說，武裝宣傳，傳單、標語、金星紅旗到處出現。就在日寇的一些兵營和偽政權的機關中也有這些東西出現。越盟的聲望震動了農村和城市，平原和山區。不僅是工人、農民、小商、小販、學生、公務人員，甚至民族資產階級和部分小地主也傾向於革命。各個救國組織，尤其是自衛隊的組織，得到了空前迅速的發展。在許多地方的敵人政權機關已經癱瘓。基層的解放委員會起來組織維持社會治安工作，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和建立革命秩序。許多地方，人民不理睬偽政權，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發生衝突糾紛，都直接找解放委員會請求解決。

沸騰的起義氣氛籠罩全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進入結束的階段，德、意法西斯已投降，日本法西斯也已日暮途窮。1945年7月，在波茨坦會議上，蘇聯決定參加東方戰線作戰。

1945年夏，胡志明同志^①已返抵新潮（屬宣光省山陽縣），這裏是解放區的革命大本營。以胡志明同志為首的黨

中央，決定召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國民代表大會。

1945年8月13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在新潮舉行，與會的有各地黨組織的代表和部分在國外活動的代表。會議決定總起義並提出指導起義的三個原則：集中、統一和及時。

會議強調必須“集中力量於各個重要地區”，必須“以軍事和政治配合”和“進攻之前先進行招降，使敵軍精神渙散。”

除決定總起義的主要問題外，會議還決定在奪取政權後有關對內對外的許多重要問題。

關於對內方面，會議強調必須重視宣傳教育和組織羣衆參加越盟陣線中的各個團體；必須注意農業生產，首先是生產糧食；規定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國旗和國歌；通過越盟陣線的十大政策，並把這十大政策作為全黨全民當前的基本政策。

關於對外方面，會議主張必須注意利用英、法、美、蔣之間的矛盾，極力避免同時應付多方面的敵人；必須盡一切可能爭取蘇聯和世界人民特別是法國和中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粉碎法國殖民者企圖再度侵佔我國和蔣幫企圖把我國變為“附庸國”的陰謀。

會議的決議指導了全黨領導越南人民起來奪取政權；同時它還指出在起義勝利後，全黨全民必須執行的方針政策。

繼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後，接着，1945年8月16日國民大會也在新潮舉行。參加大會的有中、南、北部的政治

◎ 從此處起，胡志明同志就是阮愛國同志。——原註

黨派、人民團體、民族、宗教和自國外歸來的越僑代表六十人。在會議上，全國各地的越盟代表和越南各族人民代表，第一次看到胡主席——自己的敬愛領袖。

國民大會熱烈擁護印度支那共產黨和越盟總部總起義的主張。長征同志代表黨向大會指出：在同盟軍進入印度支那之前，必須從日本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的手中奪取政權，然後以國家主人翁的資格來迎接同盟軍入境解除日軍武裝。

大會通過越盟十大政策和選出以胡志明主席為首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員會即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

日本帝國主義投降的消息傳遍全國。總起義的命令下達各地，使人民羣衆心花怒放。

全民奮起，萬眾一心，民族的倔強意志空前奮發。

解放軍自新潮出發，進攻日寇還佔據的太原市。全國各個武裝組織、自衛隊，各個救國組織和全體人民也起來舉行總起義，奪取政權。

雖然由於聯絡困難，許多地方還沒有接到中央的總起義命令，但是他們也根據中央：“日法火併和我們的行動”的指示紛紛領導人民起來奪取政權。1945年8月12日河靜省人民起義；1945年8月13日廣義省人民起義。8月14、15日，接近解放區的許多日寇據點，先後被我軍攻陷。

然而，對八月總起義獲得勝利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主要是三個大城市：河內、順化和西貢。

在河內，我黨正在積極準備起義的時候，反動分子却成立所謂“救國委員會”，企圖迷惑羣衆和陰謀反抗革命。1945年8月17日，公職員總會集會擁護陳仲金偽政府。這個

集會被響應越盟陣線號召的河內人民羣衆激烈反對和變爲擁護越盟陣線的集會。革命的熱氣騰騰。許多企業、機關和商店都停工罷市。政治性的總罷工爆發了。

1945年8月19日十餘萬河內人民在黨的領導下，舉行遊行示威，這次示威很快就變爲在首都的和平起義奪取政權的行動。

河內起義的勝利鼓舞着各個城市和許多農村地區的革命運動。這次勝利對八月革命取得全面勝利起了重大的影響。

河內起義之後，1945年8月23日順化起義也取得勝利。1945年8月25日，以陳輝燎同志爲首的中央政府代表團抵達順化，接受保大帝的遜位。

在南部，1945年8月25日，西貢一百多萬羣衆在黨的領導下，舉行遊行示威和奪取政權。

僅在十天內，八月總起義就已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勝利。自中央至鄉級都已成立了人民革命政權。1945年8月27日，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進行改組，增加了一些非越盟陣線成員和黨外人士。

1945年9月2日，河內市民和來自一些省分的人民五十多萬人在河內的巴亭廣場舉行集會，歡迎越南民主共和國第一個臨時政府。

胡志明主席代表臨時政府宣讀獨立宣言，宣佈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誕生，給越南民族的歷史揭開了新的偉大的一頁。

獨立宣言中肯定了人民羣衆的地位是歷史的創造者，革命事業的完成者，八月革命是人民在黨領導下所建立的偉大功勳。

1945年9月2日，永遠是越南民族最光輝的日子。

配合着越南的革命，老撾人民，在以蘇發努馮親王爲首的民主、愛國者的領導下起來奪取政權。同時，柬埔寨人民也起來進行革命鬥爭。

越南的革命，影響了兩個鄰國的革命運動，震動了東南亞各國和法屬非洲各地。

八月革命的勝利，結束了帝國主義八十多年來的統治和千百年來封建王朝的壓迫，使越南人民從奴隸的地位變爲國家的主人。

“一個剛滿十五歲的黨，就已領導革命成功和掌握了全國的政權，這在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的革命歷史上還是第一次。”①

取得這樣偉大的勝利，首先由於我國全民的團結鬥爭，由於幹部、黨員和各個救國會會員英勇犧牲的精神，特別重要的是由於我們黨成功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運用於越南的實際環境。

另一方面，八月革命的勝利，一部分是由於英雄的蘇聯紅軍戰勝了世界法西斯侵略者（其中包括日本法西斯），給我國人民起義奪取政權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

八月革命給了我們下面幾點經驗：

(一) 準備周密：

革命的勝利不是自來的，必須準備它，爭取它。八月革命

① 摘自胡主席1951年2月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原註

爆發的整個過程不滿十五天，但準備工作則從黨成立時起，已進行了十五年，自從黨成立至1945年，我國人民羣衆的鬥爭運動，都是爲了八月革命而進行的或大或小的演習。自1941年5月黨中央會議至1945年8月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黨的許多指示、決議都是爲了指導黨和越盟陣綫作好準備起義奪取政權的工作。

在思想方面，黨進行了克服悲觀、失望，向日、法法西斯投降、親日、利用日寇和其他錯誤思想的鬥爭，團結全黨全民爲唯一的目標而奮鬥：總起義奪取政權。

在組織方面，黨爲培養幹部，建立根據地，組織武裝和半武裝力量，奪取地方政權和建立解放區而奮鬥。同時，黨以越盟陣綫團結了各階層人民，組織“羣衆的政治隊伍”，在黨的領導下隨時準備戰鬥。

由於黨進行長期和周密的準備工作，所以全國人民已抓緊了獨一無二的時機，那就是趁日本法西斯向蘇聯和各國投降的時候，一齊起來奪取政權，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

（二）掌握時機：

在一次起義中，如果我們“正確選定時機，那我們的勝利，就有保證了”[⊖]。我們決定總起義是在主觀和客觀都非常有利的情況下決定的：世界上以蘇聯爲首的民主力量，已經擊敗了德、意、日法西斯。在越南，革命的敵人法帝國主義，已被日本法西斯踢開了，然而，日本法西斯也正是一個

⊖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見“列寧文選”兩卷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758頁——譯者註

失敗者，並已陷於極度的慌亂中，在印度支那的日軍，已沒有了鬥志；帝國主義的走狗、傀儡已失去了依靠；廣大人民羣衆爭取生活權利的鬥志激昂，各階層的中間分子已倒向革命，先鋒隊——黨已決心為領導人民羣衆徹底粉碎奴隸的枷鎖，爭取獨立和自由而犧牲。時機雖然非常有利，但它僅存在一個極短的時間。如果是在1945年3月9日的日軍發動政變之後，或在日軍向蘇聯和各盟國投降之前，我們舉行總起義，則不僅將會遭受嚴重損失，而且不一定能在全國範圍內奪取政權。反過來，如果在日軍向蘇聯和各盟國投降之後，我們還沒有進行總起義，而英、美或蔣介石的軍隊又已開入我國，陳仲金傀儡政府已與英、美、蔣軍隊接觸，或法國殖民者已捲土重來和恢復它的統治，那麼就會錯過了有利的時機。正確選擇行動時機是八月革命勝利的一個重要的經驗。

（三）成功地發動全民性的革命高潮：

“起義要獲得勝利，應當不是依靠於陰謀，不是依靠於黨，而是依靠於先進階級。此其一。起義應當依靠於人民底革命高潮。此其二”①。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原則。

八月革命已帶動了大多數人民站起來。我國人民，自北至南，自農村至城市，在人民中的各個階級，各個民族，各宗教，都緊密地團結在黨的旗幟下。在這個高潮中，工人和農民的力量最龐大，對總起義的勝利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各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卷137頁。
——譯者註

城市中成千上萬的工人、貧民、學生，和農村中千百萬的農民，在黨的領導下舉行遊行示威，以直接的行動把政權奪回來。抗日救國的高潮，顯然是一個在我國歷史中未曾有過的革命高潮。

正是由於這個革命高潮，所以我們的幹部、黨員雖然少，人民的武裝力量雖然不大，但八月革命很快就取得了勝利。

（四）善於把武裝鬥爭形式與政治鬥爭形式結合起來：

八月革命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武裝鬥爭形式與政治鬥爭形式相結合的革命。

從1940年9月北山起義後，黨主張保持武裝力量和建立根據地，以武裝鬥爭促進全國的政治鬥爭。

1945年3月9日日軍發動政變後，一般的鬥爭形式是武裝遊行，特別的鬥爭形式是在各個地形地勢有利的地區打游擊，用“名譽隊”在城市和農村進行除奸活動。當日軍向蘇聯和各盟國投降的時候，在新潮舉行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以軍事和政治結合”進行總起義。

在八月革命沸騰的日子裏，普遍的和主要的鬥爭形式是羣衆的政治性的大示威和局部的武裝鬥爭密切結合，和把各地的武裝示威遊行變為武裝起義。這些鬥爭形式導致了全國奪取政權的總起義。

（五）充分利用敵人隊伍中的矛盾，集中鋒芒對準主要敵人。

1939年11月和1941年5月的黨中央會議，主張成立廣泛性的民族統一戰線以集中力量對付民族的敵人——日、法法

西斯。

1943年2月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主張進一步擴大民族統一戰線，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大力向敵方的士兵和職員展開宣傳工作，爭取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外僑，分化在印度支那的法國人，徹底孤立日、法法西斯。

在1945年3月9日軍發動政變後，黨以“打倒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口號代替“打倒日、法法西斯主義”的口號，並集中革命鬥爭的鋒芒對準日本法西斯和越奸親日分子。

八月革命爆發，正當日本法西斯向蘇聯和各盟國投降失去了戰鬥意志的時候，實際上它們也不可能再與我們為敵，這時，黨主張中立日軍，集中力量瓦解親日的傀儡政權。然而傀儡們也正在動搖徬徨中，所以我們黨主張爭取必須爭取者和中立可以中立者，從而孤立那些最反動最頑固分子，並進一步把他們打垮。這樣，黨已盡量利用了敵人中間的大小矛盾，癱瘓了反革命的力量和粉碎了親日分子的隊伍。

充份利用敵人的矛盾，對準主要敵人進攻，這是八月革命的一個特點，也是八月革命的一個優點。

八月革命的這些經驗教訓，對我國人民在完成全國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務的鬥爭實踐中具有重大作用，同時，豐富了在帝國主義已經衰萎和社會主義已經取得勝利的條件下，一個殖民地和半封建國家的革命理論。